

2004年1月號

# 批判與再造

# 3

台灣的財政剝削與鉅額國債

■吳挺鋒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一書序言

■李其慶

“權力資本家化”和  
“資本家權力化”

■王巧麗

代序：紅色客家人

■藍博洲

霜降（三）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蒙面叢林（三）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吳音寧

世界的貧困、貧困化與資本積累

著■Samir Amin / 譯■鄭國棟

世界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貧富擴大與全球反抗

■宿景祥

批判·進步·解放

# 紅色熱血的青春與白色恐怖的年代

## 知識分子的歷史見證

### ——台灣民主運動紀實文集

《葉榮鐘全集》收錄葉榮鐘對日治時期社會運動的紀錄，及長年的散文、雜文作品，是知識份子對歷史的見證。葉榮鐘所觀照的各個層面，在在顯示身為歷史記述者的犀利議論與深度觀察。也展示出台灣歷史文化各時期的豐富面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 《葉榮鐘全集》書目：

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

NT：650元

台灣人物群像

NT：420元

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

NT：380元

半壁書齋隨筆(上)

NT：400元

半壁書齋隨筆(下)

NT：350元

少奇吟草

NT：270元

葉榮鐘日記(上、下)

NT：850(上下冊不分售)

葉榮鐘早年文集

NT：390元

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

NT：320元

葉榮鐘年表

NT：200元

## 大時代的社會運動紀錄

### ——藍博洲五〇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報導

藍博洲長久從事台灣民眾史的探訪與報導寫作，全面呈現出五〇年代，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紀錄。《天未亮》、《麥浪歌詠隊》，二書整理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始末，並採訪當時目擊事件發展或身陷其中的見證人，試圖釐清一段在過去隱約呈現的台灣歷史。《紅色客家人》則述說台灣客家人投入改革的情形，也呈現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的台灣政治風貌。這三本書透過藍博洲一針見血對於白色恐怖的紀實報導，使讀者得以了解那段被人們湮滅與刻意遺忘的歷史的真實面貌。

#### 書目：

1. 《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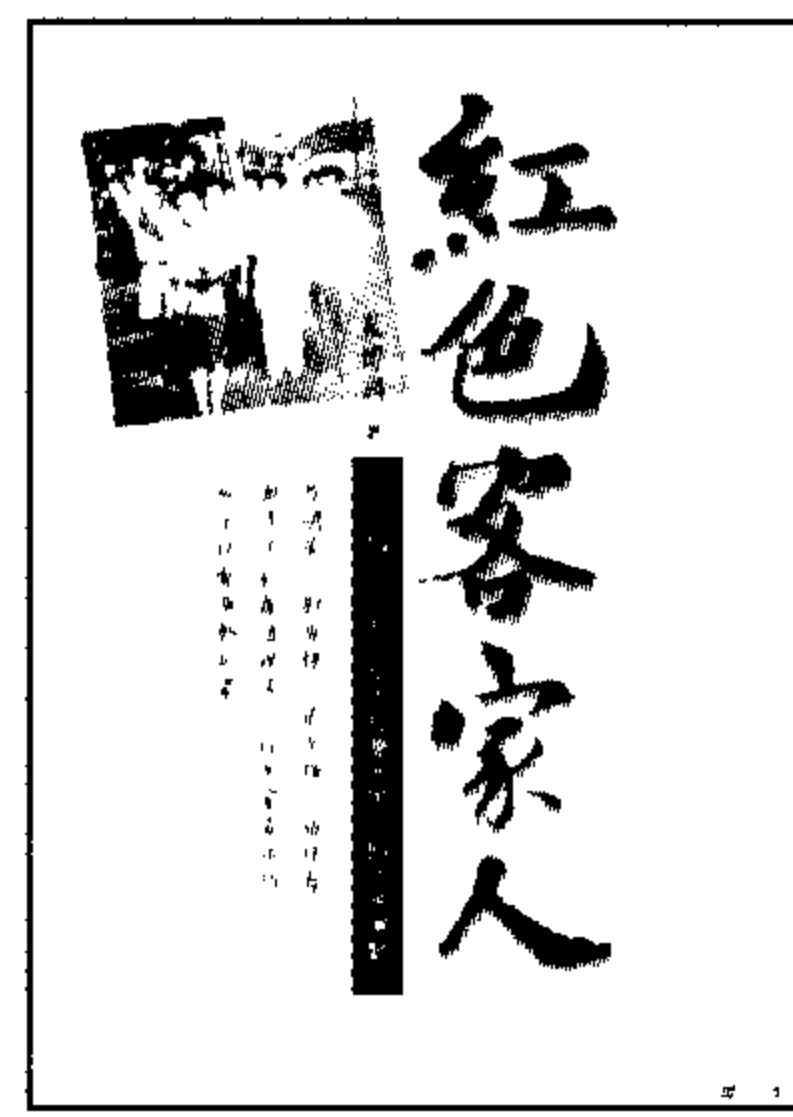
NT：380元

2. 《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

NT：380元

3. 《紅色客家人》

NT：380元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ADD: 407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 TEL: 04-23595820

FAX: 04-23597123 // E-mail: bluehan@morning-star.com.tw

http://www.morning-star.com.tw

## 全球貧富差距專題

01 世界的貧困、貧困化與資本積累  
著■Samir Amin / 譯■鄭國棟

06 世界貧富差距日益拉大

08 貧富擴大與全球反抗  
■宿景祥

## 台灣焦點

11 台灣的財政剝削與鉅額國債  
文■吳挺鋒 / 圖■人間 / 提供

## 全球化批判

19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一書序言  
■李其慶

## 大陸形勢

38 “權力資本家化”和“資本家權力化”  
■王巧麗

## 歷史檔案

41 代序：紅色客家人  
■藍博洲

45 霜降（三）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 文化廣場

52 蒙面叢林（三）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吳音寧

## 歡迎捐款贊助

郵政劃撥帳號：19803670

帳戶：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零售	90元 / 本	
訂閱	台灣地區（一般訂戶）	一年 1,000元
	（榮譽訂戶）	5,000元
	歐美地區	一年 50美元
	大陸、港、澳地區	一年 40美元
	亞洲地區	一年 45美元
【美金支票請寫明 Pay to Huang Te-Pei】		

---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27巷29弄  
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520  
電子信箱 critra99@yahoo.com.tw

---

北市建商商號092字第255400號

---

## 全球貧富差距專題

自人類的私有制確立，出現階級社會以來，階級的不平等與貧富差距問題便成了亙古長存的痼疾。《孟子·梁惠王》描述了「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的不合理現象，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慨嘆了貧富不均的悲慘景況。但貧富差距不是靜態的，而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動態發展。《老子道德經》中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聖經·馬太福音》也表示：「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中外地隔千萬里，而經典所言若合符節，交相輝映，說明了這是個普世皆然的問題。如果說階級不平等與貧富差距是古已有之的，那麼隨著資本主義的深化發展，自由市場經濟的大行其道，其惡果更是令人怵目驚心了。尤其自近二十多年社會主義力量潰退，資本全球化的呼聲高唱入雲，市場經濟論橫掃全球後，資本的勢力所向披靡，不論在一國之內或國與國之間，階級不平等與貧富差距正急遽擴大，弱肉強食，尊卑懸殊，可謂於今為烈。面對全球貧困問題的明顯惡化，民怨高漲，各國政府、媒體與各界人士也日表關切，圖謀對策，但所見大多僅及表面現象，所論大抵出諸所謂「人道」、「慈善」關懷，所提方案僅圍繞在收入分配上，籌思修補之道，未能從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結構著眼，直探本源。本刊為此製作專輯，探討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成因、現狀與後果。埃及經濟學家Samir Amin著有《全球規模的資本積累》、《不平等的發展》、《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等名著是依附理論學派的要角，他從全球資本積累的角度分析了全球農民與勞工處境日艱、貧困化問題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因素，批判了左右各派對市場的迷信，為了解世界的貧困問題提供了深刻的洞見，值得細讀。■□編者

# 世界的貧困

著■Samir Amin / 譯■鄭國棟

# 貧困化與資本積累

**如**今，認為貧困如不徹底消除也必須縮小其範圍的論調正大行其道。這是十九世紀式的慈善論調，以當前的科技能力本已足可消滅貧困，這種論調卻不試圖了解滋生貧困的經濟與社會機制。

## 資本主義與新的農業問題

在現代資本主義時代之前，所有的社會都是農民社會。它們的生產由各種特定的制度與邏輯所支配——但與市場社會中的資本主義有所不同，支配資本主義的是資本最大利潤這樣的制度與邏輯。

現代資本主義農業——包括富有的大規模家庭農業與農業公司——現在正對第三世界的農民生產大舉進攻。2001年11月WTO在卡達的杜哈（Doha）召開的會議上給這項行動開了綠燈。因此而受害者為數頗多——大多數是仍佔人類一半人口的第三世界農民。

資本主義的農業受資本獲利的原則所統治，幾乎都位於北美、歐洲、澳洲與拉丁美洲的南錐經濟體內，從事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的僅有數百萬已非農民的農場主。由於機械化的程度與每位農場主管理的農場面積廣大，農場主的人均生產率介於1到2百萬公斤的穀物。

對比懸殊的是，30億農人從事小農耕作。他們的農地在生產規模、經濟與社會特徵、效率的水平上皆有極大的差異，可歸為兩種不同的類別。一類是能夠從綠色革命、得到的肥料、殺蟲劑、改良的種子獲益並有某種程度的機械化的農家。這類農民的生產率是每年可收穫1萬到5萬公斤不等的穀物。然而，無法享用新技術的農民，據估計其人均生產率是每年大約1千公斤的穀物。

全世界農業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部分與最貧窮的部分兩者的生產率之比，在1940年之前大約是10:1，如今則趨近於2000:1！這意謂

農業與糧食生產部門的生產率發展比其他部門都不平等得多。同時，這樣的演變也使糧食產品相對於工業與服務業產品的價格下降到僅有50年前的五分之一。農業的新問題是上述不平等發展的結果。

## 歐美發展模式無法在第三世界重現

現代化總是結合了積極有益的方面（即資本的積累與生產率的提高）與破壞性的一面（把勞動貶低為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經常摧毀生命與生產兩者的再生產所需的自然生態基礎，並在全球造成財富分配的兩極化）。現代化也總是同時產生吸納與排斥的作用，在市場擴張創造就業時吸納了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則在喪失了原先體制內的工作崗位之後，沒有被納入成為新的勞動力，遭到了排斥。在資本主義的上升階段，它在全球的擴張過程中既排斥又同時吸納了諸多勞動力。但如今，在第三世界的農民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所排斥者眾而吸納者寡。這裡引發的問題正是：對仍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農民社會中生產與生活的30億人民來說，這樣的趨勢會不會持續發生作用。

的確，如果農業與糧食生產真的與其他形式的生產一樣，服從開放且解除管制的市場的競爭規則，按照2001年11月WTO在杜哈所決定的原則辦事，那會有麼結果？WTO的原則會促進生產的加速嗎？

可以設想，今天由30億農民在維生之餘賣給市場的食物，改由2千萬新生的現代農場主生產。實現這種改變的條件須包括：(1)良田沃土轉手給新興的資本主義農場主（這就必須從目前的小農手中奪走這些土地）；(2)（用來購買食品與設備的）資本；(3)銷往消費市場的通路。具備這些條件的農場主當然可以贏過目前數以十億計的小農。但這數十億人民會

有什麼下場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同意WTO強加給農產品與糧食的普遍競爭原則，就意謂贊成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消滅數十億沒有競爭能力的生產者。這數十億人大部分已是生計艱難的貧中之貧，他們結果會怎樣呢？在50年內，縱使依照純屬幻想的假設，持續每年有7%的經濟成長率，也無法吸收這數十億待業人口的三分之一。

為WTO的競爭教條合理化的主要論點是說，19與20世紀的歐美國家產生現代、富裕、城市工業與後工業的社會，而與之並生的現代農業可以養活全國人口，甚至出口糧食。為什麼這樣的模式不能在當代的第三世界國家重現呢？

這個論點沒有考慮到，有兩個因素使歐美模式無法在第三世界國家再現。第一，歐洲模式有150年是與勞力密集的工業技術一道發展的。現代技術所使用的勞動要少得多，而新近工業化的第三世界工業輸出品若要在全球市場有競爭力，就必須採用現代技術。第二，歐洲在從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的漫長歷程中，有大量過剩人口移民到美國，從而獲益良多。

### 只有毛澤東了解第三世界的農業問題

認為資本主義在其發達的中心國家確已解決了農業問題的論點，為很大一部分左派所接受，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寫的名著《農業問題》就是個例證。蘇聯的意識形態承襲了這個觀點，並據此而運用史大林主義的集體化來推動現代化，結果成效不佳。過去老是忽視了：資本主義之能解決中心國家的問題，是用的在外圍國家製造深重的農業問題換來的，而資本主義只有靠滅絕人類的半數才能解決外圍國家的農業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只有毛澤東思想才瞭解

這一難題之艱難。因此，那些非議毛澤東思想是偏離馬克思主義正軌的農民社會主義的人正是自暴其短，顯示他們缺乏分析能力以理解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他們把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簡化為泛論資本主義的抽象論述。

WTO及其支持者主張通過資本主義市場的自由化來完成現代化，這樣的現代化把本來必要結合在一起的兩個組成部分，分置並列：一方面，全球規模的食物由具有競爭力的現代農場主生產，這些農場主大部分位於北方，但未來在南方的一小部分區域也可能會有這類農場主；另一方面則是第三世界的30億農民大多會邊緣化、工作無著、更加貧困，最終被隔離在某些保留區內。因此這樣的規劃把支持現代化、效率至上的論述和讓受害者在物質生活（包括生態）日益惡化的狀態下苟延殘喘的一套生態—文化—保留區政策結合在一起，從而使這個組成部分可能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衝突。

我們能設想出其他的方案，引發廣泛的討論嗎？這些方案既能在21世紀的可見未來維持農民的農業，但同時又能不斷推動技術與社會進步。這樣一來，農民就會循序漸進地轉換到離鄉離農的工作。

這樣一套戰略性的目標必須要有兼含國家、地區與全球層次的複雜政策。

在國家層次上，必須有宏觀的政策保護農民的糧食生產，免於遭受現代化的農場主與本地及國際農業公司的不平等競爭。這將有助於確保可承受的國內糧食價格，與受到北方富國的農業補貼格外扭曲的國際市場價格脫鉤。

這樣的政策目標也質疑工業與城市的發展模式，主張工業與城市發展不該著重於出口導向（即為保持低工資而必須壓低糧食價格），而該多措意於以社會分配均衡為基礎的國內市場的擴張。

同時，這也必須要有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整體政策——這是一個國家在全球共同體中要作為積極主動的成員，享有自主與談判的必要餘地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在地區與全球的層次上，必須要有擺脫支配WTO的自由貿易教條的國際協定與政策，即把特定的問題與具體的歷史、社會條件考慮在內，針對不同區域用富有想像力的特定解決方案來取代WTO的自由貿易原則。

## 新的勞動問題

現在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至少有30億人約佔人類的半數，而農民則構成在統計上沒什麼意義的另外一半人口。根據這些人口資料，我們可以區別出何者可稱為中間階級，何者為人民階級。

在資本主義演進的當前階段，統治階級（正式擁有主要生產資料者與高階經理人）僅為全球人口的很小一部分，雖則他們從社會產出的收入中佔有可觀的份額。在此之外，我們再加上舊有意義上的中間階級——非工資收入者、小企業主與中階經理人，這些中間階級並不必然在衰減中。

現代生產部門中的大量工人由工資收入者構成，發達的中心國家的城市人口五分之四以上是這些工資收入者。這些工人群眾至少劃分為兩類，其間的界線既是局外觀察者明晰可見的，也真實地存在被劃分開的個人的意識中。

有一類我們可稱之為穩定的人民階級，他們的工作相對來說較有保障，這尤其是因為他們的專業資格賦予他們與僱主談判的權力，因此，他們（至少在某些國家）經常組成強有力的工會。這個群體具有政治影響力，加強了他們的談判能力。

另一類構成了不穩定的人民階級，這包括那些由於技術水平低、不具公民身份或受到種

族、性別歧視而談判能力低的工人，也包括失業者與在非正式部門工作的窮人等非工資收入者。我們可稱第二類的人民階級為“不穩定的”，而不宜稱之為“未被納入的”或“邊緣化的”，因為這些工人完全被納入了支配資本積累的整体邏輯。

從發達國家與某些南方國家（我們由這些南方國家的資料推估出數據）可到手的資訊，我們可得到上述兩大類人民階級在全球城市人口中所佔的相對比例。

雖然中心國家只佔全球人口的18%，但由於它們的人口有90%居住在城市，故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是在中心國家。（見表一）

表一：全世界城市人口百分比  
（統計僅是近似值，  
百分比的加總結果可能不一致）

	中心國家	外圍國家	世界
富有與中間階級	11	13	25
人民階級	24	54	75
（穩定的）	(13)	(11)	(25)
（不穩定的）	(9)	(43)	(50)
合計	33	67	100
相關人口數			
單位：（百萬）	(1,000)	(2,000)	(3,000)

全球有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是人民階級，而全世界的人民階級中又有三分之二屬於不穩定類別（中心國家的人民階級約有40%，外圍國家的人民階級中則有80%屬於不穩定的類別）。換句話說，不穩定的人民階級至少佔世界城市人口的一半，外圍國家不穩定人民階級的比例更遠高於此。

## 半個世紀來不穩定的人民階級人數躍升

檢視半個世紀前二次大戰後的城市人民階

級的組成，顯示人民階級結構的特點，今昔之間有極大的不同。當時第三世界的城市人口不到全球10億城市人口的一半，而今天則佔三分之二。今天所有南方國家的大都會，當時尚不存在，僅在中國、印度與拉丁美洲有一些大城市。

在戰後時期，中心國家的工人階級迫使資本接受具有歷史意義的妥協，人民階級因而受惠於這個特殊例外的情勢。這項妥協使得大部分的工人在“福特制”工廠制度這種勞動組織下獲得穩定。在外圍國家，不穩定人民階級的比例總是大於中心國家，但在當時也不到城市人民階級的一半（今天則已超過70%）。另外一半穩定的工資收入者，一部分在新殖民經濟與現代化社會中工作，一部分靠手工業謀生。

二十世紀後半葉，主要的社會變遷的特點，可以用一個統計數字概括：不穩定的人民階級的比例，由不到全球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躍升至超過半數，而且這種貧困化的現象已經大規模重現在發達的中心國家裡。在半個世紀內，生活不穩定的城市人口從不到2億5千萬增加到超過15億人，增長率高於經濟擴張、人口成長或城市化本身。貧困化——再也沒有更好的詞來稱謂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演進趨勢了。

總之，這個事實本身已在新的流行用語中被承認與重申：“減少貧困”已經成了政府反覆重彈的施政目標。但貧困問題只是被當做由經驗數據衡量的事實，非常粗糙地用收入分配（貧困線）或比較不那麼粗糙地用綜合指標（像聯合國提議的人類發展指標）提出來，卻不問產生貧困的邏輯與機制。

我們要更深入地揭示這個同樣的事實，這樣就可以著手解釋貧困化現象及其演變。中間階級、穩定的人民階級與不穩定的人民階級全被納入同一個社會生產的體系，但在其中各自執行不同的職能。有些人實際上無緣享有繁榮

的好處。被排斥者是體系中的一大部分人，而如果邊緣化是指沒有被納入體系執行職能，那就不能說他們被邊緣化。

## 貧困化是資本主義擴展的產物

貧困化是個現代才有的現象，絕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收入不足以維生。貧困化實則是貧困的現代化，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造成破壞性的結果。來自鄉村的移民在黃金年代（1945-1975）常能成為工廠工人，相對較好地納入了穩定的人民階級。如今那些新近入城的人與他們的孩子只能在主要的生產體系的邊緣謀生，這為用社區的團結取代階級意識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婦女比男人更受經濟不穩定之害，導致她們的物質與社會處境更加惡化。若說婦女運動無疑在思想與行為領域已有長足的進展，從這些成果中獲益的幾乎都是中等階級的女人，貧困化的人民階級婦女當然無福消受。至於民主，由於民主無法制止越來越多的人民階級的生活條件惡化，其可信性從而其正當性已日益削減。

貧困化是與全球的兩極分化無法分割的現象，是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擴張的固有產物，因此我們必須按其本性稱之為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

城市人民階級的貧困化與犧牲第三世界農民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第三世界的農民社會屈服於資本主義市場擴張的要求，支持了新形式的社會兩極化，使越來越高比例的農民無法利用土地。這些變窮了或失去土地的農民以高於人口增長的數量移向城市的貧民窟。但只要自由經濟的教條不受到質疑非難，而且在自由經濟的框架內沒有正確的政策能制止其擴散，那麼所有這些現象都會每況愈下。

## 進步的社會運動必須驅除市場論的病毒



貧困化使經濟理論與社會鬥爭的戰略都受到質疑。

傳統的庸俗經濟學理論迴避了資本主義擴張所引起的真實問題。這是因為庸俗經濟學把資本主義想像為簡單而持續擴展的交換關係（市場），用這套理論來取代對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的分析，實則資本主義體系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關係（不是簡單的市場關係）為基礎來運行並再生產的。這樣的取代很容易與視市場為自行調節且產生最佳社會效果的先驗概念配套，這種先驗概念不論是歷史或理性的論證都無法加以證實。於是貧困就只能被解釋為是人口增長或政策錯誤這類外在於經濟邏輯的原因造成的。貧困與資本積累過程的關係也就被傳統的經濟理論置之不理了。自由市場論的病毒污染了當前的社會思想，摧毀了瞭解世

界的能力，更別提要改造世界了，這種病毒已深深滲入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組成的各式各樣左派人士中。目前致力於為尋求“另一種世界”與另類全球化而鬥爭的社會運動，如果驅除這種病毒以形成紮實的理論辯難，就能產生重大的社會進展。只要社會運動還沒驅除這種病毒，即使有最好的動機，也仍然會陷在舊思維的鐐銬裡，因而淪為高唱減少貧困這種無效的矯正主張的囚徒。

上述的概略分析重新建立起資本積累與社會貧困化現象兩者之間的聯繫，應可促成展開這種辯論。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首開先例分析了這種聯繫背後的機制，卻鮮有人步武其後，更幾乎沒有在全球範圍內形成風氣。◎

（譯自Monthly Review 2003年10月號）

# 世界 貧富差距 日益拉大

**據**世界銀行發表的《2000-2002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數字，1999年，低收入人口為24.17億，佔世界人口的40.5%，國民生產總值（GNP）987.6億美元，僅佔世界GNP的3.4%；高收入人口8.91億，佔世界人

口的14.9%，而GNP達22921.3億美元，佔世界GNP的78.4%。按人均收入比較，佔世界人口20%的富人和20%的窮人相比，1965年前者為後者的30倍，1990年擴大到60倍，到20世紀末已擴大到70多倍。聯合國開發計畫署1998年的報告指出，佔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費全球貨物和服務的86%、能源的58%、紙張的84%、電話的74%和汽車的87%以及肉和魚的45%，而佔世界人口20%的窮人僅消費全球貨物和服務的1.3%、肉和魚的5%。

美國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1998年擁有淨資產達510億美元，相當於1997年烏克蘭5000萬人口GNP的524億美元。蓋茨、沃爾頓家族、巴爾特和艾倫四大富翁的財產淨值達1530億美元，相當於1997年巴基斯坦和菲律

資兩國2.1億人口GNP的1565億美元，而世界10大巨富擁有的資產相當於所有不發達國家國民收入的1.5倍。現在全球有26億人缺乏最基本的衛生設施，20億人無法喝到合乎標準的飲用水，有20%的兒童受教育時間不足五年。

### 富國與貧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不平等

進入21世紀，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仍是不平等的，初級產品與製成品價格的“剪刀差”是這種落差的主要表現。消費咖啡最多的是西方國家，咖啡價格下跌受益的是西方國家，受害的則是非洲、拉美生產國。從1950年到1970年，咖啡的實際價格下跌了29.7%，而一輛拖拉機的價格則上漲了一倍以上。據聯合國公佈的數字，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出口的初級產品價格，1971年比1950年下降了4%，而發達國家出口的工業製成品價格，同比上漲了44%。由於製成品和初級產品價格“剪刀差”不斷擴大，從1960年到1972年，發展中國家損失了1034.94億美元。到1998年，世界初級產品價格仍比80年代末低15.3%，而工業製成品價格則上升了5.5%。

據統計，到1969年，美國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石油佔其石油需求的62.9%。美國跨國公司獲得了中東石油租借地的2/3，控制了石油生產的54.8%，煉油能力的38.1%。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每桶原油價格不到兩美元。2000年9月，每桶石油價格上漲到38美元。源源不斷的廉價石油供應，是西方國家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初級產品和製成品價格“剪刀差”不斷拉大，使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地位日益下降，1990年，發展中國家出口在世界出口總額中所佔比重已從1980年的28%降到20.9%，到1999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貨物貿易總額中僅佔28%。48個最不發達國家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總數的

13%，而這些國家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中所佔比重卻從20年前的0.8%降到現在的0.4%。

### 美歐推行自由貿易 卻用大量補貼來擴大市場

美歐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採取的策略是，利用推行貿易自由化之機，依靠大量補貼來擴大市場。例如，由於廉價傾銷農產品，僅美國、歐盟和加拿大就控制了全球3/4的農產品出口市場。為了使發達國家剩餘農產品的價格能夠應對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同時確保國內生產者的穩定收入，發達國家普遍採取直接或間接補貼的做法。歐盟曾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大量出口劣質牛肉，佔領非洲國家市場。從1974年到1989年，對向非洲出口肉類的歐洲飼養者的補貼，從每公斤2.5法郎增加到每公斤6.91法郎，這樣就使得向非洲國家出口的肉類比當地肉類還便宜，從而限制了當地牛肉生產的發展。

歐洲偏向對出口提供直接補貼，而美國則側重向生產者提供直接資助。北美和西歐國家在1990年平均用於農業補貼的開支佔其農業生產總值的41%。世界貿易組織建立以來，發達國家對本國農業的補貼並未減少。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1998年發達國家對農業的補貼佔這些國家農業收入的37%。1999年經合組織成員國在農業上的補貼達3000多億美元。發達國家根據不同產業和不同時期，交替使用自由化和保護主義兩種策略，對內實行保護主義，主要武器和手段是反傾銷。1997年，歐盟實施的反傾銷中有26.6%涉及到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巴西等出口大戶，有20.8%涉及中國。這些反傾銷的大部分是以虛構的傾銷為依據的。相反，發展中國家卻被迫逐步消除了它們的自我保護。◎

（刊摘）

轉載自：<http://globalview.cn>

# 貧富擴大 與 全球反抗

■宿景祥

**21**世紀世界的精神生活註定要比以前任何時代都要複雜。這是因為，當今世界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每一個層面，都日益清晰地表現出整體性、體系性的運動。全球化這個概念的流行，正是這種時代轉變的一個標誌。在這種體系性的運動中，經濟生活既是基礎，也是核心。與此同時，針對這種新的整體性運動，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抗。這種反抗既有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方面的深度反思和批判。也有西雅圖、熱那亞和紐約街頭的反全球化抗議活動，本·拉登和“基地組織”，本質上也屬這種反體系運動的一部分。

## 全球範圍內和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反體系運動之所以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勃興，很重要的一個誘因，是全球範圍內貧富差距顯現出日益擴大的趨勢。眾多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研究結果發現，這個世界的確變得越來越不公平，越來越不平等。按

1960年的美元計算，1800年，人均年收入美國和西歐分別為213美元和260美元，印度為160—200美元，中國為228美元，“第三世界”的平均水準為200美元左右。到1976年，西歐達到2325美元，而整個“第三世界”卻停留在355美元的水準，遠遠地落在了富國的後面。1800年，世界上最富裕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貧困國家的5倍。1976年時，瑞士的人均收入水準已經是莫三比克的52倍，而1997年達到了508倍。目前，發達國家的年人均收入是25510美元，而在第三世界最貧困國家，只有約300美元。世界上最富有的3個家族的財富總和，比最不發達國家6億人口的年收入還要多。人口眾多的阿拉伯國家至少有1億貧困人口，其中有7300多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儘管科威特的人均年收入達到2萬多美元，但蘇丹、茅利塔尼亞、索馬里和葉門等國家卻只有300多美元。

在南北之間貧富差距擴大的同時，各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

會新近發表的一份報告，目前美國的貧富差距是歷史上最嚴重的。1993年時，美國5%上層家庭佔全部國民收入的21%，至2001年這一比重已上升至22.4%。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只佔有1.5%的財富。另有數字顯示，在澳大利亞，10%的人擁有全部財富的45%。在義大利，10%高收入家庭擁有全國財富的50%，每5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的資產不足1萬歐元。在英國，1980年達不到全國平均收入水準的40%的人口有100萬，1999年，這一數字增加到了800萬。英國財政部報告說，每4個英國人中就有一人在貧困中掙扎。印度在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貧困人口的同時，也擁有5萬名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富豪。在阿拉伯國家，有近20名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富豪。

### 貧富分化問題成為反抗運動的突破口

世界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邪惡，首先是侵略與戰爭，其次是剝削與貧困。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人類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的生活，就始終充滿了悲苦，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為擺脫貧困而鬥爭。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就是由希望消滅剝削、消除貧富所激發出來的。20世紀最後的10年的蘇東劇變，並沒有消除戰爭的危險，在世界範圍內，無論是富國和窮國之間，還是各個國家內部，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正是這一點，使得怨恨之情充斥整個世界。

在中東、南亞和拉美等地區，十幾年前被許多國家領導人信奉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現在變成了急於甩掉的歷史包袱。第三世界許多政治領袖，轉而義憤填膺地指責西方國家政府和大公司。無數激進的青年被吸引加入從事暴力反抗活動的組織之中。

在發達國家，貧富差距的擴大同樣成為反資本主義制度的突破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幾十年裡，美國和西歐等大多數國家因受社

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和挑戰，曾不得不施行一些社會福利制度以緩和階級矛盾和衝突。但是，隨著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西方國家逐漸取消了社會福利，致使國內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階級對立再次公開化。“有組織的騷亂”行為越來越常見，矛頭直接指向各國政府、大型跨國公司，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

### 反抗運動將成為同政府相抗衡的力量

20世紀60年代美歐各國的學生運動，曾經催生出一大批知名學者和政治活動家。世界體系理論的代表人物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貢德爾·弗蘭克等人，都曾經是切·格瓦拉的崇拜者。弗蘭克厭倦了芝加哥大學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隻身遠赴拉丁美洲，試圖追隨格瓦拉。許多人都確信，目前異軍突起的反體系運動，勢必也將造就出新一代的政治活動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當代著名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一直被許多知識份子視為一面旗幟，代表著“知識份子的良心”。他的《無賴國家》、《利潤高於人民》等著作對美國的新帝國主義的性質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抨擊。他說政府同大公司的緊密結合，國家機器有意識地維護聯合起來的壟斷資本家的利益，使得大公司無孔不入，侵佔了公共空間，是民主最危險的敵人。

加拿大女記者拿俄米·克萊因近年來被國外許多媒體譽為“反體系運動最有影響的理論家和代言人”。她在1999年11月西雅圖抗議活動結束不久，出版了《別廢話：瞄準名牌惡霸》一書。克萊因在這本書中，將耐克、IBM和迪士尼等大型跨國公司稱為“名牌惡霸”，並對其展開猛烈攻擊。在她的筆下，大公司為了追求利潤，不惜犧牲任何社會利益。無所不在的廣告和名牌產品讓消費者無所適從。這些公司

不僅僅出售“品牌”、形象，還在出售新的生活方式。大公司趕走了當地的工廠和商店，減少了就業機會。大公司操縱政府，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不顧環境保護和勞工標準，在第三世界設立“血汗工廠”。她號召人們行動起來，從這些大公司手中奪回民主。

儘管在過去一些年裡，反抗運動已經顯示出強大的影響力，但迄今仍然無法對它的性質得出斷然的結論。按照克萊因的闡釋，反體系運動就是“反潮流”，其核心思想是打破各種“正統勢力”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壟斷，恢復民主，還政於民。鑒於反體系運動掌握著道德的武器，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將註定成為可以同政府相抗衡的力量。

## 貧富差距和反抗運動 是當今時代的一個突出特徵

貧窮和富有是相對的概念，而且十分複雜。以往人們過於強調意識形態，往往走向極端，容易曲解現實。即使是在經濟學領域，過去一些年裡頗為流行的理論，隨著世界經濟的深度低迷，現在也陷入了危機。不久前，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領袖密爾頓·弗里德曼出人意料地對自己多年來宣導的理論作了檢討。曾經宣稱將改變傳統經濟學基本原理的美國“新經濟”理論，兩年前就被擠出了美國經濟學雜誌的版面。◎

(刊摘本刊有刪改)

轉載自：<http://globalview.cn>

## 稿約

歡迎踴躍投稿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

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六·來稿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達。

# 台灣的 財政剝削與鉅額國債



文■吳挺鋒

圖■人間 / 提供

## 一、前言

**1980**年代中晚期是台灣社會鉅變的分水嶺，斯時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面向的議題紛至沓來、齊頭並進，在在讓當時的台灣得以一新。如今回顧，這個被打開來的解嚴空間一度讓政治、經濟、社會這三個領域對於未來的詮釋充滿了各種不確定的競逐。惟這個歷史機會卻是異常地短暫，並且從1990年代起便逐漸明朗化。由於社會運動的自身挫敗（例如遠化罷工慘遭撲滅，以及工

黨的分裂)與國家機器的系統性鎮壓(例如郝柏村擔任閣揆期間對於「社運流氓」的掃蕩),社運首先成為1990年代的敗部一員,而這也讓之後的台灣失去對資本主義邏輯進行挑戰的活潑動能。

事後回顧,社運的燦爛一時與急遽失去能量,使得政治本土化(被等同於民主化;國民黨的李登輝與民進黨則是該符號的代表)與經濟自由化成為1990年代後的共識論述,而這兩者也試圖將社運所可能鼓動的不滿規訓成某種體制內爭餅的遊說、立法等壓力行動,並盡可能地使其對結構性的變遷無從發言與著力。面對這樣的變局,財政機器自然無法自外於這個新的圖像,而其財政狀況盛極而衰地由先前的財政平衡轉為經常性的赤字,則是這個新的社會權力關係角逐後的示意訊號。要言之,從1980年代末以降,台灣的財政機器愈來愈靠舉債賒借作為自身物質基礎的融通,而這也正是政治本土化與經濟自由化的財政調控共識所致。

政治本土化與經濟自由化之間所存在的親近性不只是邊緣化了曾經竄起的社運,同時也是受惠於舊的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的瓦解。如果代表勞工、農民、婦女、生態等運動變得消沈,而成為難以撼動體制的耳邊雜音,則不難想見所謂政治「本土化」所希望召喚的歷史正當性基礎在有效排除上列後,真正甄選的對象便是他們的對立面:資本,以及「自由化」的利益。歷史地看,這毋寧是個大改變。因為在此之前,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權力來源並不特別著重於與台灣社會本身的互動,甚至無須在正當性的經營上乞求於特定社會階級的認同首肯。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華民國在台灣」之所以延續乃首先受惠於美援所代表的政治支持瞭解一二。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像李國鼎那種技術官僚出身的背景幾乎在政策制訂與執行上罕受當時社會的掣肘,根本無須顧慮社會的可能反映與抵制的情形得到另一旁證(反之,作為美援會要員的李國鼎往往扮演了蔣介石與美援團的核心中間人,這是他得以施展的彈性優勢位置)。此外,既然國府的正當性授權來源非來自於社會內部,故也讓政治上的有限選舉與軍事鎮壓的配套處在一個相對長期安枕無虞的狀況。也因此,即便是布爾喬亞階級也未必有意願質疑這樣的威權體制,而寧可選擇與之合作。最後,相對於台灣社會,國府所駕馭的國家機器之所以看似「凌空」,擁有高度的相對自主性,更見諸於財政調控模式。特別是菸酒專賣利益與公營事業盈餘對於財政收入貢獻的功能卓著(直到1980年代,兩者合佔財政收入比重約兩成),致使國府得以透過這個龐大的國家資本(實際上為官僚資本)的控制與管理直接在財政上造血,而此情形在在不同于西方的賦稅國家(tax state)的存在需以市場布爾喬亞階級的支持為前提。

對於以反共復國為念的國民黨政府而言,誠如其宣示的台灣意象是一個「反共跳板」。在這樣的情形下,專賣的財政壟斷與公營事業部門可說是一種戰爭財政的動員形式,故與其倡議的「民生主義經濟」實際上是風馬牛不相及。或許拜戰爭之賜,國家資產與公營事業因此而被大規模地保留下來,儘管所託非人,但無論如何這都使得國府在推動資本主義發展或鞏固其統治基礎時,都享有了相對充裕的政治迴旋空間。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台灣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中小企業「向外做生意」,以及地方派系僅被容許擁有區域性的寡占事業(例如信合社、地方客運)可以獲得印證。

## 二、分水嶺

就財政觀察,從黑字轉為赤字的1980年代中晚期業已徵候性地說明了上述的情勢不再,而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色澤盡褪,以及利潤率的下滑所導致的積累危機則是其中關鍵。值此時

刻，逐漸壯大卻遇瓶頸的資本則選擇了（1）從生產轉向貨幣投機；（2）資本外移與勞工輸入；（3）自由化與私有化三方並進的作法。而這也使得從1990年代起，國債愈滾愈大，財政補貼成了愈來愈難避免的支持手段。



貧富差距擴大，勞動者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亡。

## 2-1、所得與財富的分化與兩極化

從1980年代起，匯率的大升值、美國貿易報復與其他新興工業國家的工業競爭力加強，當時構成了台灣外銷工業化積累的瓶頸。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看到了不堪利潤率降低的資本抽離出實質生產的投資而成為閒置貨幣，並對應了台灣史上頭一遭的股市、房市的雙雙狂飆。股、房市的旱地拔蔥與投機化使得我們對於貧富差距這個概念必須重新理解。官方所根據的「可支配所得」早已不敷現實，儘管我們仍可從官方的統計資料裡看出這個可支配所得的差距正在擴大中。但更細緻地講，靠薪資所得的藍、白領勞工階級與無須依賴所得，而是大量擁有股、房資產來構成財富的資產階級才是1990年代以後真實的「貧富」加劇的新推力之一，貧者賴之所得（當然，失業等同於所得的喪失與歸零），而富者透過財富增值（誠如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所說的，他每月只領16萬元。然而，他卻是台灣的科技首富，僅鴻海一年(2003)股利便約有135億元）。對應於財稅的反映，台灣雖然國民租稅負擔率年年滑落（2003年跌破13%創歷史新低），但這並不意味



薪資所得階級的財政負擔有所減輕，因為台灣的稅收主要來自所得稅，而其繳納者更有八成來自於薪資所得階級。反之，與土地、股市有關的財富形成、累積的賦稅政策如土增稅的按實價課徵與證所稅的免徵，皆使得這些財富的擁有罕受財政機器的干擾，甚至受其保護。是以，若說所得與財富之間的不同乃1990年代後的「貧富差距」的推力之一，則其財政機器則為其添加柴火助燃，而各擁所得與財富所導致的懸殊化也說明了台灣社會階級的兩極分化趨勢。不只如此，更由於台灣遺產稅的課徵效果淪為形式，因此也導致了富者的內部再生產甚至以準世襲的方式延續下來。

## 2-2、資本輸出與勞動力輸入

資本遭受到利潤率降低的困境另有資本輸出與勞動力輸入作為替代應對。1980年代末也是台灣產業開始外移而引發「產業空洞化」爭議的序幕。如前所述，對於社運的鎮壓當然是國家試圖替資本力挽利潤率的作為之一，畢竟像是工運、環保運動都是資本邏輯擴張的阻礙。與此同時，財政手段的運用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利潤率補貼來源，作為資本「根留台灣」、「投資台灣」的吸引。主要集中於公共建設，支出規模達五兆八千億的六年國建以高額舉債的方式來支應所需財源，率先開啟了赤字的閘門，其性質就像歐康諾（O'connor, James）所說的該「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使得資本所需負擔的成本得以外部化，進而成為私人資本的利潤率的財政輔助手段。除了內需公共建設的財政支出外，1990年尚有〈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通過，而這種具有隱藏性減稅效果的稅式支出更是對資本利潤率的系統性補貼（表一）。

除了財政手段的補貼外，廉價勞動力的供應也是另一緩和利潤率下降的來源。外籍勞工

表一：我國產業賦稅減免概況

（單位：億元，%）

		總計
		占當年度稅收比重
80 年度	464	5.7
81 年度	449	4.6
82 年度	461	4.4
83 年度	297	2.6
84 年度	225	1.8
85 年度	240	2.0
86 年度	308	2.4
87 年度	489	3.5
88 年度	554	4.4
89 年度 (1)	906	4.7
90 年度	696	5.5

此處所指的產業賦稅減免包括了外銷沖退稅、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資料來源：主計處第三局國情統計通報

從1980年代進入台灣即是如此背景的產物，而1992年〈就業服務法〉的通過更意味了這個新勞動力政策被體系化地認可，並被細緻地操作。如果我們把外籍勞工政策當作國家對資本的補貼形式之一，那麼為了避免功虧一簣，則國內勞工也同樣是這個情境下的祭品，從職位的部分工時化、勞動條件的彈性化與基本工資的數年凍結都是如是對應下的衍生產物。

### 2-3、自由化與私有化

除了上述兩個發展，自由化與私有化也在差不多的時期開始進行。在1987年，菸酒專賣雖然繼續維持，但已在美方壓力下先行開放菸酒市場而完成了「消費自由化」（公賣局今已改制為台灣菸酒公司，並即將進一步私有化）。此外，公營事業的私有化也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被端上了議程，同年則成立了「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小組」為私有化敲槌定音。儘管當時的籌謀尚未到立即行動的地步，但實際上，私有化可說是日後必然兌現。因為對資本而言，要想挽救下滑的利潤率，則必須要有新的市場，若捨外移，則只好內求。在這樣的情況下，存在著大規模公營事業的台灣可說是一個不充分的市場，故公營事業遂成他們亟待拓荒的「大西部」。從1990年後，被官方牢牢掌握，且視為金雞母行業的銀行業開始自由化，16家新銀行獲准申設，不但證明覬覦者眾，同時這種高獲准率也說明了國家有意「放權讓利」。值得注意的是，私有化往往給了資本家之間一個合縱連橫的操兵機會，故在效果上等於讓資本家得以實質集結而逐漸培養出不同於以往的政治力量。此外，包括國家與其政治侍從地方派系的關係也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改變，靠地方客運、信合社等區域寡占起家的老派系注定是這個新浪頭下的慢性淘汰者，唯有能夠打開地方格局，甚至向上擴張者才能佔領權力高地，取得全國性商銀（泛亞銀行）的長億楊天生家族可說是當時變局的箇中寫照，當時如日中天的長億再也不是屈居一地的土霸王，而是得以四方擴張的資本集團。誠然日後長億集團爆發了財務危機，而泛亞銀行也隨之易主，但這也說明了當初開放新銀行來試圖解決資本利潤率危機的作法只有短線刺激，長期的結構性問題並未真正獲得解決，故衍生了今日人人皆謂的銀行過度競爭（over-banking）問題，然而從RTC的例子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雖然財政補貼不會是斧底抽薪的萬靈丹，但卻絕對無法撒手，甚至還有劑量加重的必要。

## 三、國債危機

1990年代後，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所共同信奉的「本土化」其實是上述積累危機的政治反映。以所謂「本土菁英」作為甄補來源的國會（全面）改選則是這個新的權力關係歷經1980年代解嚴真空後的洗牌結果。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的技術官僚連番在證所稅復徵與土增稅改革二案慘遭「民意」痛擊的原因之一。不是郭婉容等人的能耐不如李國鼎，而是彼此所面對的環境已經截然不同。

這十多年來，台灣的減稅愈加頻繁，而且幅度愈來愈大，也說明了當時的資本積累危機實際上並未抒解，甚至還已經結構性地陷入到不透過財政機器扶一把便危機叢生的地步。1990年代後，台灣經濟成長率由早期的高度成長下滑到近年的中低度成長，甚至步上衰退皆為其證，而這也再次迫使國家非得以更大的力道進行財政補貼作為護持。

瞭解了這一點，則國債的鉅額累積便是必然的財政結果（見表二、三）。面對這筆還在滾的

國債，事實上根本無從清償。癥結倒是非關財政調控的意願，而是一旦清償，則對下列兩個對象而言都意味了嚴重損失：一、持有國債的資本集團。特別是壽險等金融資本都持有大量的公債，一旦喪失了這個可靠、安全的孳息，則勢必對這個食利的金融資本構成打擊。二、原先被財政補貼的資本。清償國債對他們而言等於停止（同等程度的）補貼，而這將讓他們原先的利潤率縮水，其影響則是投資將進一步地緊縮，故最後的結果必然是更嚴重的經濟衰退，而這也是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所無法坐視的。也因此，面對這個病情加重的資本主義，國家只能持續以財政補貼來緩和這個利潤率下降的危機。

如前所述，台灣的真實「貧富差距」早該重新換把量尺來檢驗，而朝向兩極分化的趨勢迄今更未停歇。若是再加計國債這個財政剝削機制，則我們務必理解到這筆國債總額的分攤絕非個人主義式的「每個納稅人平均負擔多少國債額」，或某種錯誤的世代政治口號，像是「債留子孫」。實際上，這筆國債之所以產生，係是因應台灣資本主義危機所衍生的財政

表二：債務存量（債務未償餘額占GDP比重）

年度	債務未償餘額	債務未償餘額／ 國內生產毛額
76	88,250	2.88%
77	138,425	4.11%
78	190,082	5.10%
79	198,843	4.83%
80	264,726	5.84%
81	566,117	11.14%
82	798,732	14.22%
83	915,310	14.79%
84	1,102,440	16.38%
85	1,225,592	16.71%
86	1,384,382	17.35%
87	1,384,062	15.95%
88	1,334,764	14.61%
88 下半年及 89	2,477,650	25.64%
90	2,807,718	29.42%
91	2,963,852	30.27%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  
網址：<http://www.dnt.gov.tw/>

表三：國債的流量指標（當年度舉借債務數占年度支出比重）

年度	當年度舉借債務數		支出總額	當年度舉借債務數 ／支出總額
		不列入債限		
76	41,500		422,977	9.81%
77	66,800		483,866	13.80%
78	73,282		562,240	13.03%
79	44,386		726,014	6.11%
80	111,008		875,813	12.67%
81	340,266		1,098,361	30.98%
82	284,990		1,179,194	24.17%
83	174,078		1,098,333	15.85%
84	230,480		1,155,113	19.95%
85	214,202		1,204,279	17.79%
86	265,294		1,385,082	19.15%
87	109,671		1,260,039	8.70%
88	74,835		1,430,688	5.23%
88 下半年及 89	392,632	80,000	2,622,762	14.97%
90	277,000	99,160	1,826,577	15.17%
91	255,000		1,61,583	15.35%

- 1、本表76年度至88年度下半年及89年度為審定決算數，90年度為院編決算數。
- 2、本表當年度舉借債務數及其占支出總額之計算不含債務基金為償還舊債而新舉借部分。
- 3、88下半年及89年為因應九二一震災依緊急

命令舉借之800億元，及90年度九二一重建特別預算舉借之991.60億元排除排除公共債法規定限制。

資料來源：國庫署（2002/05/27），

網址：<http://www.dnt.gov.tw/business/business208.asp>



鉅額國債壓在他們肩上。

產物，故環繞著國債的利得與負擔其實是一個嚴肅的階級分配問題。資產階級根本無須負擔國債，因為他們是國家機器運用財政補貼的受益者與國債的製造者，反之勞工階級（包括他們的下一代）才是真正要面對國債償還的強制債務人。殊為明顯，當財政補貼走到了求助於國債這一步時，也意味了原有的稅收早已不敷這個補貼黑洞，此為勞工階級這個實際稅基同樣遭受到竭澤而漁的困境。

這個悲觀的圖像當然是台灣的不祥兆頭，其社會結果不只是貧富差距的加劇，而且還是兩極分化。惟若我們將層次放大到國際，則無論是西方的OECD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其實也都（也是更早）面臨到財政赤字高築的國債危機現象。換言之，這些現象都共同地指向了作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恐怕已經到了被推進加護病房的階段。◎

## 小啟

1. 本期因稿擠，RCA職工專訪系列暫停一次，下期續刊。
2. 第二期所刊俄國國家社會科學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的演講日期，應為2003年10月24日，編者按語誤為11月初，特予訂正。

# 全球化背景下的 新自由主義

##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一書序言

2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充當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意識形態工具，為世界各國的右派保守政黨與學術界、大眾媒體奉為主臬。這套理論不但矛盾百出，禁不起嚴格的理性批判，也通不過經濟現實的檢驗。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全球化呈現了一幅可怖的景象：各國失業率不斷上升，貧困人口劇增，貧富差距有增無已，富國與窮國的鴻溝日益加深，億萬民衆飽受煎熬痛苦。大陸學者李其慶的這篇論文，全面、扼要地概述了新自由主義的內涵、起源、特徵、實踐的後果及發展的趨勢，為我們提供了新自由主義理論一個完整而清晰的輪廓，本刊特予全文轉載。由於兩岸的中譯人名不盡相同，我們在中譯人名後附加了原文。■□編者

■李其慶

### [摘要]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矛盾發展的產物。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建立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新秩序和資本的世界積累制度。在實踐上，新自由主義具有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行雙重標準的特點。新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綜合，它沒有也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發達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一方面拓展了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新的矛盾和危機，特別是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以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從而引發了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這場鬥爭在世界範圍內，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全面展開，其發展趨勢將取決於影響鬥爭雙方力量對比的各種因素。

[關鍵字] 新自由主義 當代資本主義 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社會矛盾發展的產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呈現出紛繁複雜的現象。新自由主義具有多元性，它有多種名稱如新保守主義、新古典綜合主義等，又區分為多種理論流派如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倫敦學派、弗萊堡學派等，但又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徵。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可追溯到二戰後甚至更早，但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全球化時期，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新自由主義內在矛盾的展開，使我們能夠更深刻地認識新自由主義，並對它作出全面、客觀的評價。

## 一、自由主義的內涵

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是對新自由主義本質的概括，為了從總體上把握新自由主義，我們對它的分析首先從它的定義開始。《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的作者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新自由主義』，顧名思義，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該理論體系也稱為『華盛頓共識』，包含了一些有關全球秩序方面的內容……所謂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所制定，並由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在經濟脆弱的國家，這些理論經常用做嚴厲的結構調整方案。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註一）該書導言的作者羅伯特·W 邁克傑斯尼(Robert W. McChesney)又對這一定義做了補充說明，他指出：“新自由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範式——它指的是這樣一些政策與過程：相當一批私有業者得以控制盡可能

廣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取最大的個人利益。新自由主義首先與雷根和柴契爾關聯，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黨派、大多數傳統左派和右派所採取的全球政治經濟趨向。這些黨派及其實施的政策，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註二）法國“馬克思園地協會”主席科恩·賽阿直接從全球化角度對新自由主義作出界定，他指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上述界說大體上概括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規定，是我們對新自由主義開展研究的基礎。

## 二、新自由主義的起源

新自由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實現程度，取決於資本主義發展對它需要的程度。同任何理論一樣，它都有一個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我們首先考察一下它的主要理論流派的基本情況：

現代貨幣學派：現代貨幣學派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的反凱恩斯主義學派。代表人物是密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條，認為市場自發力量可以使資本主義經濟自然地趨向均衡，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動盪都是由於實行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錯誤的財政金融政策造成的。他反對凱恩斯主義用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金融政策來消除失業，提出所謂“自然失業率”的概念，即在沒有貨幣因素干擾的情況下，讓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的自發供求力量發揮作用時所應有的、處於均衡狀態的失業率。按照這一概念，就業水準應取決於勞動市場的一般條件，而不應該取決於政府的就業措施。

弗里德曼反對由國家運用傳統的貨幣政策

註一：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註二：同上書，第1頁。

來調節貨幣流通量，主張實行所謂“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即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長期固定在同預計可能有的經濟發展速度大體一致水準上的貨幣政策。這種理論被稱為貨幣主義。貨幣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在政策主張方面的分歧只是在於維護壟斷資本的統治和攫取最大限度利潤方面的策略和手法上各不相同。在面臨失業與通貨膨脹同時發生的情況下，凱恩斯主義者主張把減少失業放在優先地位，以便在擴大生產過程中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潤；而貨幣主義者則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優先地位，實質上是用緊縮貨幣供應量的辦法來製造更多的失業，以龐大的產業後備軍隊伍來對抗工人階級提高工資的合理要求。

供給學派：供給學派是7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的一個反對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在美國，供給學派存在著“極端供給學派”和“溫和供給學派”之分。極端供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保羅·羅伯茨(Paul Roberts)等人。他們企圖通過恢復金本位制來緊縮貨幣供給量，從而降低通貨膨脹率；主張對富人減稅，刺激其增加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對窮人削減福利開支，刺激其工作的積極性，從而增加社會的有效供給和實現政府的預算平衡。供給學派理論對“雷根經濟學”有很大影響。1979年，供給學派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成了美國共和黨的競選綱領。

理性預期學派：理性預期學派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原先是現代貨幣學派的一個分支，但到80年代以後迅速崛起，成為新自由主義影響最大的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羅伯特·E·盧卡斯(Robert E. Lucas)、羅伯特·J·巴羅(Robert J. Barro)等人。他們利用70年代凱恩斯主義陷入危機的有利時機，在新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理論的基礎上，運用理

性預期方法，對宏觀經濟理論進行了反思，對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進行了抨擊，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是錯誤的，政策是無效的。其錯誤在於違反了西方經濟學關於合乎理性的人這一基本的假定。而根據該假定，人們的預期也是合乎理性的。在理性預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說根本無效。理性預期學派沒有給政府在經濟事務中以任何權力，認為政府可以徹底地退出對經濟的干預。

倫敦學派：倫敦學派形成于20世紀30、4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利奧尼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erich A. von Hayek)等人。他們堅持自由放任，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例如，哈耶克甚至認為，國家壟斷貨幣發行權是70年代滯脹的根源，因而主張以貨幣的私人銀行發行取代國家發行。

哈耶克20世紀30年代參與了西方經濟學家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可行性的論戰，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攻擊。他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干預和法西斯統制經濟混為一談，加以否定。他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質是：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所有產品都歸集體所有，即由中央權力機關控制資源，個人沒有任何經濟自由。他認為，經濟效率來自利己的動機，計劃經濟使個人失去自由選擇的機會，造成人為的不平等待遇。在公有制條件下，國家控制了全部生產資料，從而擁有任何雇主所不曾有過的權力，使個人的一切活動不得不服從國家管理機構的支配。這種社會主義計畫的實質是中央集權。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立論的基礎是資本主義促進個人自由，而社會主義則妨礙個人自由。哈耶克反對公有制，他認為正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獨立行為體手中，個人才沒有被他人控制，因此才能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自己的命



運。這不僅對有產者是如此，對無產者也不例外。因為無產者雖然受雇於有產者，但是他也可以自由地離開自己的雇主。因此只有在私有制社會中，人們才有自由選擇的機會。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雖然有缺陷，但它仍不失為個人自由選擇的最重要的保證。

1947年4月，馮·哈耶克在瑞士沃州佩勒蘭山召開會議並成立佩勒蘭山協會，其宗旨一方面是要反對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另一方面是為建立一種自由的、不受任何約束的資本主義模式奠定理論基礎。

弗萊堡學派：弗萊堡學派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主要是在戰後發展起來的。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是瓦爾特·歐根(Walter Eucken)和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他們把自己的理論稱為“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它既不同于傳統的經濟自由主義，又不同於各種形式的國家干預主義。他們認為，政府的責任不應是直接干預私營企業的經濟事務，而必須是制訂和執行私人經濟活動所應遵守的規則，鼓勵競爭，為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創造適宜的環境。從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同社會民主黨內的凱恩斯主義者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結果是新自由主義的主張被兩黨所接受。從此，這一學派就成為西德的主流派。“西德奇跡”創造了新自由主義取得成功的範例。但是，這個範例也是一個例外，因為戰後西方其他各國都奉行凱恩斯主義。

總的來看，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西方多數國家都實行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直到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弊端徹底暴露，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才被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取而代之。凱恩斯論證了市場本身的缺陷在於無法充分利用生產資源，因此，需要政府運用各種社會經濟政策來調節社

會總需求，才能夠使資本主義免除大量失業和經濟危機。

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凱恩斯主義指導下，經歷了長達30年之久的高速經濟增長。這一黃金時期被稱為“凱恩斯時代”，而新自由主義觀點由於不符合時代潮流，受到冷落，沒有被西方國家統治集團所接受。

20世紀70年代，西方經歷了兩次戰後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整個西方經濟長期陷入“滯脹”，而凱恩斯主義者卻提不出有效對策，從而使他們信奉的經濟思想陷入危機，走向衰落。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各種流派已經匯合成一股巨大的潮流，準備迎接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和危機的挑戰。伴隨著雷根和柴契爾的上臺和經濟全球化，出現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西方經濟學家也把這一現象叫作“新古典復興”。

### 三、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

資本主義危機根源於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凱恩斯主義之所以能夠“拯救”資本主義，並不是因為它解決了這個矛盾，而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這個矛盾，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又產生了新的矛盾，而凱恩斯主義由於自身的局限性，無法解決這些矛盾，必然讓位於新的理論，由它來推動資本主義繼續發展。新自由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興起的，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外部條件，因此，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現在我們就來考察這些因素。

#### 1. 凱恩斯主義失靈

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是一種宏觀經濟理論，其實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進行調節，以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生產要素的完全過剩現象，

為了克服由此而產生的危機，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因此，只要生產要素的完全過剩存在於西方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理論就有效用。但是進入70年代以後，西方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生產要素的完全過剩，而是生產要素的不完全過剩：一方面，由於初級產品不足和資源的有限性使某些生產要素供給不足，另一方面，某些生產要素如勞動力、固定資本存量則供給過剩。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結構是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此外，這種狀況同歷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也不無聯繫，例如二次大戰的軍事開支、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戰後歐洲和日本的重建等等，抵補了30年代的經濟停滯，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這些因素的作用已發揮殆盡，因此出現了30年代以來的最大衰退。

在生產要素的不完全過剩條件下，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滯脹”問題，反而使這一問題更加嚴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針對的是供給過剩的生產要素，其作用是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吸收過剩生產要素，從而促進經濟回升。但是，在生產要素的不完全過剩條件下，從理論上說，需求管理政策一方面會引起供給不足的生產要素的價格上漲，從而使通貨膨脹的壓力增強；另一方面會吸收供給過剩的生產要素，從而刺激經濟的回升。但是，在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在生產要素的不完全過剩條件下，因供給不足的生產要素制約著過剩的生產要素，首先只能作用於供給不足的生產要素，從而使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在嚴重的通貨膨脹下，又進一步加劇了供給不足的生產要素對供給過剩的生產要素的限制作用，從而使某些過剩的生產要素的過剩情況更加嚴重。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在70年代失靈之

因。由於凱恩斯理論的宏觀目標與微觀基礎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或遲或早總會發生，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反對凱恩斯宏觀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就會抬頭。

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David M. Kotz)從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變遷的角度，闡述了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原因。他認為，“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接受新自由主義是對那一時期經濟不穩定的回應。公司利益集團認為凱恩斯的干預方法對其不再有利，必須尋找其他出路，並找到古典自由主義，認為它至少可以為削減被看作是贏利障礙的政府計畫提供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持續統治可以用世界資本主義競爭結構的變化加以解釋。世界資本主義競爭結構的變化形成了至今仍然發展著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特殊形式。資本主義這種變化了的競爭結構改變了大企業對於經濟政策的政治立場，使大企業從國家管制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變成反對者。”（註三）

## 2. 經濟全球化

如果說凱恩斯主義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反映）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內因，那麼經濟全球化則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外因。新自由主義者敏銳地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例如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John R. Hicks)在其《經濟學展望》一書中認為，在布雷頓森林體制時期，充分就業確實是經濟增長的極限。但是，70年代以來，實際起作用的經濟增長極限已不再是一個，初級產品供給不足應該說是又一個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他認為，在至少兩個極限中，初級產品供給不足將首先發生作用，而要增加初級產品供給，就必須實行全球範圍的經濟擴張。兩次能源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脆弱性，而要克服這種脆弱性就必須進行全球範圍內的生產要

註三：大衛·M·科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載《反思馬克思主義》雜誌2002年夏季號，總第14卷第2期。

素的整合和經濟結構的調整。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80年代初，拉美國家遭遇債務危機，被迫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解體，“兩個平行市場”消失。所有這些因素都在客觀上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而新自由主義理論正是在這一進程中竭力為自身的實施尋求外部條件的。正如美國學者阿蘭·G 納賽爾所說，“儘管人們大都認為是雷根發動了新自由主義的戰鬥，而實際上自由主義早在雷根上臺之前就差不多已經在經濟理論和政治學的戰鬥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如果說最初新自由主義還是紙上談兵的話，那麼經濟全球化以後，新自由主義就大行其道了。

### 3.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力量對比發生變化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不僅是一個經濟現象，同時也是一個政治現象，因此它的興起必然有一定的政治環境和條件。20世紀80-9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轉入低潮。而在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大蕭條時期，前蘇聯的社會主義計畫化和經濟的高速增長，曾經是美國大搞“羅斯福新政”的外在強制因素。戰後西方建設福利國家也是為了與社會主義相抗衡。但是，長期以來，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選擇了高度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中國基本上複製了蘇聯的模式，實行單一的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以及政府指令性的計畫體制，經濟效率低下，社會主義優越性不能充分發揮。而中央指令性計畫經濟的弊端卻日益暴露。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跌入穀底，西方國家不再感到國際上社會主義的壓力，新自由主義更加肆無忌憚。

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 科茨認為，蘇東社會主義的消亡、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削弱、資本主義長期以來未爆發大的經濟危機是

促成新自由主義興起的三個重要因素。他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存在迫使資本主義採取國家管制主義模式。它加劇了資本家階級的恐懼，害怕本國工人階級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它也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產生影響，增進了它們之間在美國領導下的團結，這也有利於國家管制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的存在和運行，而1989年蘇東劇變則消除了這一因素。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力量極大地削弱。雖然社會民主黨在許多歐洲國家執政，但是它們不再威脅資本主義，而只對它進行改良。19世紀末，德國為了對付世界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運動，建立了成熟資本主義時代的第一個管制主義大國。歷史證明，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威脅消退時，保持管制主義國家的動力也消退了。此外，他認為，嚴重經濟危機的爆發也會促進管制主義。因為克服危機需要強有力的國家干預。而戰後資本主義沒有經歷像30年代那樣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就降低了保留管制主義國家的需要的迫切性。他認為，正是這三個因素促成了新自由主義的抬頭。（註四）

## 四、新自由主義的特徵

在全球化條件下，新自由主義有了新的發展，並呈現出新的特徵，這些特徵深刻地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 1.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秩序

經濟全球化以前，新自由主義不僅停留在理論上，而且有地域的局限，主要流行於發達國家，甚至某一種新自由主義理論只流行於某一國家，例如，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只流行於德國，其目標也僅僅是對德國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進行調節。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建立全球秩序。這一目標是同資

註四：同上。

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相聯繫的。經濟全球化標誌著資本主義進入國際壟斷階段。新自由主義代表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它要建立的是資本的世界積累制度。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規律和自由平等原則，但是，由於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化中占主導地位，廣大發展中國家處於被剝削的地位，這種全球秩序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平等。

## 2.新自由主義的雙重標準

戰後發達國家在國內長期推行國家干預主義並收到實效，實行新自由主義必然遭到抵制和反對，因此，它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實行徹底的自由主義。但是，它們卻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經營模式。包括放鬆對資本和金融市場的管制，私有化，限制或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減稅等。在國際範圍內，新自由主義主張商品、服務、資本、貨幣的跨國自由流動，實行所謂自由市場理論。但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非關稅壁壘等措施，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目前，發達國家的非關稅措施已達2700多種。自由貿易理論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禁止政府補貼。但是正如曾任關貿總協定秘書長的經濟學家派翠克·洛評論的那樣，“正是羅奈爾得·雷根，這位酷愛放任自由、戰後國家的最高管理者，領導實現了30年來最大的保護主義轉向。他比起半個多世紀以來所有的前任，給予了美國產業界更多的補貼。他領導了有錢有權者自70年代初發起的對自由貿易原則的持續攻擊，雷根主義者各項措施的限制性影響是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的三倍。”（註五）“威弗萊德·瑞格洛克(Winfried Ruigrock)和羅·凡·杜德(Rob Van Tulder)通過對跨國

公司的大量研究發現，世界上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公司的經營策略及其競爭地位都一直受到政府決策或貿易保護政策的支持，並且1993年世界百強中至少有20家公司，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撐，是不可能獨立生存下來的。”（註六）這些事實打破了跨國公司“中性論”和“無國籍論”的神話。新自由主義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具有極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這種虛偽性和欺騙性，在全球化條件下，在對待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所使用的雙重標準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 3.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制度安排

新自由主義是通過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安排達到擴張目的的。這些安排包括一系列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和一系列國際政治組織如西方7國集團、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盟等等。這些制度安排從本質上說，是為國際壟斷資本利益服務的。美國學者、《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的作者諾姆·喬姆斯基把世界貿易組織在這方面的作用概括為以下5點：“（1）為美國干涉別國內政提供工具。（2）為美國大公司兼併別國企業提供便利。（3）使資本家和富人受益。（4）將成本轉移給消費者。（5）為對付反民主威脅（因為任何反市場的政府都是反民主的）提供武器。”（註七）

那麼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有什麼關係呢？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作了最好的回答，他指出，“無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在世界貿易組織，美國都起著核心作用。它擁有否決權。如果美國反對，就將一事無成。它所採取的行動，不以美

註五：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第49頁。

註六：同上書，第23頁。

註七：同上書，第54頁。

國和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以金融界的特殊利益為出發點，美國人民從資本市場自由化導致的全球市場不穩定中受到損失，而華爾街卻得到好處。”（註八）同西方跨國公司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絕不是“中性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俄羅斯制定的“休克療法”，為拉丁美洲國家制定的“結構調整方案”，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有兩個職能，一是調節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內部的利益關係；二是調節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關係，以確保發達國家的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的确立，標誌著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已經成為世界性的、統一的階級。

#### 4. 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範式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新自由主義理論不僅是一個經濟理論，而且還是一個政治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一個典型的民主體制社會裡，自由市場占主導的發展模式是最行之有效的。因為最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體系即自由市場經濟不僅體現個人自由選擇的理想，而且能夠在效率、經濟增長、技術進步、分配的公正性等方面使經濟績效達到最優化。國家僅僅承擔有限的經濟職能：界定產權、確保合同的執行以及調節貨幣的供給。這種類型的國家干預顯然對壟斷資本的大企業有利。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正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因為新自由主義以自由的名義反對任何對市場的有計劃的控制，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現存制度即金融資本主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新自由主義者表面上是要維護作為人類最高價值準則的自由，但實際上，他們只是維護自身利益。這就決定了新自由主義必然走向政治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也是政治專制主義。正如《資本主義黑皮書

——自由市場經濟的終曲》的作者羅伯特·庫爾茨(Robert Kurz)指出的那樣：“自由主義源於專制主義並和後者一樣包含了極權主義的特徵，因此它最終只是現代極權主義的一個變種而已。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他代表了一個更多是以『經濟』為基礎的市場極權主義，要求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市場的支配。自由主義因此積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獨立的個性為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又創造出別名為『龍形海怪』的具有鎮壓性質的國家機器；一方面提出責任自負和所謂自主的主體之間締結條約（勞動合同、交易合同）的原則，另一方面又將無主體地自動運行和裝配了能自行調節的價格機制的社會資本機器確定為前提條件；一方面承諾『看不見的手』具有造福人類、促進繁榮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範圍內人為的和史無前例的大眾貧困。”（註九）

## 五、新自由主義的實踐及其後果

### 1. 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的實踐及其後果

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的政策主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 （1）私有化政策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特徵。新自由主義主張對社會所有資產和服務實行私有化，把社會所有的土地、基礎設施和企業賣給私人投資者，將公共部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轉化成私人部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在英國，20世紀80年代，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開始實行私有化政策，首先是在公用部門，然後又擴大到社會福利部門，整個80年代，共有600億英鎊的國有資產被賣給或者轉賣給私人投資者。任何公共活動，從監獄到護照的發放，都可以成為私有化的對象。就業

註八：《挑戰華盛頓共識》，載《布朗世界事務》雜誌2003年冬春季號，總第9卷第2期。

註九：羅伯特·庫爾茨：《資本主義黑皮書——自由市場經濟的終曲》上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頁。

數位的變化可以反映英國私有化的規模：柴契爾夫人上臺時，政府民用事業就業人數為77萬人，到90年代中期，只有5萬人了。

在美國，私有化採取不同的形式，被稱作部分私有化。政府通過轉包或者憑單形式購買私人提供的服務，以此放寬對私人企業的管制，允許私人進入以前由政府獨佔的領域。這樣，國家不再以直接生產公共品的方式來提供服務，而是讓人們從接受政府發包任務的私人供應商那裡購買服務。

## （2）削減社會福利政策

新自由主義者反對社會福利制度，他們認為龐大的社會福利開支已經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社會福利制度的推行，降低了經濟效率，削弱了國際競爭能力，減少了利潤。新自由主義要求大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和降低國家在這個領域的作用。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調節失業率，認為勞動市場可以通過工資漲落和勞動力供求間的自發調節而實現充分就業。就業水準應取決於勞動市場的一般條件，而不應該取決於政府的措施。大大減少社會福利支出，就會迫使工人同意以最低工資就業，而企業主因能獲得更大利潤會擴大投資，導致失業進一步減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大幅度減少社會福利支出，例如，根據雷根制定的經濟復興計畫通過的預算支出法案，1982年削減支出325億美元，1983和1984年再分別削減440億和514億美元。削減主要落在社會福利計畫支出上，包括失業保險金、住房補貼、傷殘補貼、家庭補貼、學生補貼、食品補貼等等。

## （3）減稅政策

新自由主義主張減稅並承認富人會得利，因為只有富人才有足夠的資金去投資，而只有“合理”的稅率才能吸引富人去投資。1981年，雷根政府制定的減稅法案即《經濟復興稅

法》規定：全面降低個人所得稅。從1981年10月1日開始削減5%，1982年7月1日和1983年7月1日再各減10%，在33個月內共減25%。個人收入中利息、紅利等非勞動收入的最高稅率自1982起從70%減到50%。資本收益最高稅率自1981年6月起從28%減到20%；減免企業稅，縮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從1981年起，廠房折舊期由32-43年縮短為10-15年，機器設備折舊期由5-15年縮短為5年，汽車折舊期縮短為3年。據統計，1982財政年度減稅372億美元，1983和1984財政年度分別減稅927億和1,499億美元。這些稅大部分本應由大資本家交納。

近10年來，美國400名巨富的收入急劇增加。而且由於美國新的減稅措施的實施，他們將更加富有。據美國《紐約時報》援引美國國內稅收署公佈的最新統計資料，2000年，美國400名巨富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74億美元，幾乎是1992年的4倍。但據美國國內稅收署的報告顯示，美國巨富們所交納的個人所得稅的比例正在下降。2000年他們所交納的個人所得稅的平均比例為收入的22.3%，不但低於1992年的26.4%，更大大低於1995年的29.9%。這主要是長期資本增值稅稅率降低和可以抵稅的慈善性捐贈增加所致。2003年5月28日，布希總統簽署了一項新的減稅法案，在10年內減稅3500億美元。隨著布希政府新的減稅計畫的實施，美國巨富們的財富還將快速增加。

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的實踐產生了雙重後果。新自由主義順應全球化發展的潮流，發揮了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和經濟上的優勢，發動了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升級的運動，與此同時，從宏觀和微觀角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框架內，對國內的生產關係和經濟關係進行了調整，增強了國際競爭能力，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擺脫了70年代“滯脹”的困

境，贏得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不同程度的繁榮。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實踐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後果。

### (1) 導致消費需求不足，阻礙經濟增長

新自由主義的實施的確使通貨膨脹率在短短幾年內急劇下降。美國每年的通貨膨脹率從3.5%（1980）下降到1.9%（1986），在聯邦德國，從6.3%（1981）下降到0.1%（1986）。在英國，從18%（1980）下降到3.4%（1986）。所有其他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90年代的通貨膨脹率保持在2%以內的水準上。但是，新自由主義主張減少公共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壓低工人工資，使社會購買力降低，而減稅政策又使收入和財富向已經富裕的階層轉移，這就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取代了通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從GDP增長率（表1）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表2）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註十）

表1：西方主要國家GDP增長率（年均增長的百分比）

國家	1950-1973	1973-1999
法國	5.0	2.2
德國	6.0	2.1
義大利	5.6	2.3
日本	9.2	2.9
英國	3.0	2.0
美國	4.0	3.0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0年）；美國經濟分析局（2000年）；麥迪森(Maddison)（1995年，1983年）

表1顯示了6個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1950-1973年和1973-1999年兩個時期內年均實際GDP的增長率。無論就這6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就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整體而言，第一個時期都是國家管制資本主義的興盛期。第二個時期是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6大資本主義國家的GDP增長率在第一個時期明顯地要快於第二個時期。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和西歐主要國家的經濟相對蕭條，而美國經濟在過去的10年中呈現繁榮。新自由主義者聲稱，美國堅持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了回報，而偏向保守的歐洲和日本則陷入了停滯之中。表2顯示出1948-1999年3個不同的小階段內美國經濟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表2的第1欄表明，在美國從國家管制資本主義向新自由主義模式過渡的1973-1990年，GDP的增長率要慢於1948-1973年。雖然GDP的增長在1990-1999年間略有提高，但仍遠低於國家管制資本主義時期。有些分析家援引1995年後GDP增長加快的事實，即1995-1999年的年均增長率為4.1%（美國經濟分析局2000年數字）。但是，將20世紀90年代商業週期中短暫的擴張階段與1948-1973年經濟的長期表現相比，沒有意義。

表2：美國GDP、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年均增長百分比）

年代	(1) GDP	(2) 每小時產出
1948-197	33.96	2.88
1973-1990	2.87	1.33
1990-1999	3.12	1.96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2000年）；美國勞工統計局（2000年）

表1的第2欄顯示，1948-1973年較高的勞

註十：參見大衛·M·科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載《反思馬克思主義》雜誌2002年夏季號，總第14卷第2期。

動生產率在1973-1990年的後半期下降了許多。雖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較快，但仍然低於1948-1973年的比率，儘管在過去的10年提高生產率的資訊技術迅速發展。

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事實表明，新自由主義模式在資本主義經濟表現的主要方面要比國家管制資本主義模式差。

## (2) 導致泡沫經濟，資本主義經濟面臨新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在金融領域推行自由化政策。1971年8月布雷頓森林體系廢除，黃金非貨幣化，美元自由浮動以及1979-1982年間美英等發達國家相繼實行的金融自由化和放寬管制政策，催生了歷史上空前的泡沫經濟。道一鐘斯工業股票指數自1900年誕生以來，花費了60多年時間，才於1966年在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基礎上逼近1000點大關。然後又用16年突破了這一關口。隨後的股市暴漲創下歷史最高水準。1989-1995年，道一鐘斯工業股票指數從2508.9點上升到5117.1點。1997年又飆升到7908.3點，1999年3月25日突破1萬點大關，達到10006.8點。股票市場僅花費了17年時間，就超過了證券交易在20世紀82年間資本化總額的十幾倍。（註十一）金融投機猖獗。1990-1997年，扣除通貨膨脹因素，股市投資回報率為13.1%。某些投資基金，例如對沖基金的投資回報率為30%。金融交易額達到天文數字。“以美國為例，1966年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還占到80%，無關的只占20%；而到1976年，即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5年後，其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就只剩20%，而無關的則上升到80%。到1997年，世界貿易額當年為6萬億美元，而世界貨幣交易額為600萬億美元，即與生產流通有關

的貨幣交易額只占到1%，而美國當年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到0.7%，……據德國一家研究機構的資料，目前世界各國累積的貨幣發行總量，已經是世界年度GDP總額的60倍。”（註十二）金融投機造幣的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凱恩斯主義財政擴張政策造幣的規模，但是這種現象之所以沒有導致通貨膨脹，是因為這樣造出的貨幣只是間接地作為需求在起作用，而且大部分仍然留在金融體系中。除了股市泡沫以外，還有房地產泡沫、網路經濟泡沫、新經濟泡沫等等，不一而足。西方學者把這種現象叫做賭博資本主義。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過度分離，頻頻引發危機並預伏著更大的危機。大壟斷資產階級可以從這些危機中受益，而廣大勞動群眾則深受其害。

## (3) 加劇西方國家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一個預設騙局。私有化意味著全部所得歸私人所有。但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並不意味著社會資源的平等佔有。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場競爭必將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導致由少數人壟斷社會最多資源和資本，而大多數人將失去一切。戰後，為了緩和市場經濟下尖銳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西方國家都加強了國家對資本的限制和社會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但是新自由主義卻反其道而行之，從而加劇了社會結構的兩極分化。在美國，1973-1992年間，20%的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0%，而20%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則減少了12%。1995年，在美國全體男性職工中，有4/5的人每個工作小時的實際收入比1973年減少了11個百分點。美國政策研究所和“爭取公平經濟聯盟”1999年8月20日聯合發表的一份年度調查報告說，過去10年中，美國工人和公

註十一：羅伯特·庫爾茨：《資本主義黑皮書——自由市場經濟的終曲》下卷，第816-817頁。

註十二：李其慶：《金融全球化的成因與特徵》，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4期。



司高級經理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1980年公司高級經理的平均收入是工人的42倍，1998年則增大到419倍。如果美國工人報酬的增長速度與公司高級經理相同，那麼他們目前的年收入將超過11萬美元，而不是實際上的2.9萬美元。調查顯示，1998年美國大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平均收入達1060萬美元，比1990年的180萬美元增加了近5倍。1998年美國公司經理的平均收入增加了36%，而同期藍領工人的收入只增長了2.7%。目前美國約有20%的人的收入在全國貧困線以下，有760萬人靠救濟金度日，有200萬人無家可歸。而與此同時，百萬富翁的數目卻從80年代初的280萬增至400萬，增幅超過40%。據《福布斯》雜誌預測，在下一個400位最富有的美國人名單上，將有250位是億萬富翁，比1998年增加六成。英國貧富懸殊的程度不亞於美國，最富有的20%的英國人平均佔有的國民財富是最窮的20%的人的10倍。在德國，自1980年以來，獨立經營者的收入增長了126%，而雇員的收入只增加了50%。德國百萬富翁的人數60年代初只有1.4萬，1973年底也只有21.7萬，而到1998年則突破了100萬。按歐盟的標準，德國現在有700多萬人屬於窮人之列，其中有270萬人靠領取社會救濟過活，有86萬人無家可歸。（註十三）在1991年至1997年間，全體法國人的財產從21萬億法郎增加到26萬億法郎，相當於增加了12%。然而，就在這同一時期，由於失業率上升和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法國職工收入增長速度卻明顯放慢了。法國有半數家庭擁有的財產還不到50萬法郎，而10%的人卻把持著全部財產的65%。（註十四）

### 1. 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及其後果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義對發達國家和發展

中國家實行雙重標準。事實上，發達國家從未實行過徹底的新自由主義。而它們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實行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義。為了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美國首先在發展中國家培養這方面的精英人才。美國芝加哥大學專門為來自拉美的學生設立了經濟學博士學位點。根據1956年智利和美國簽署的雙邊協議，智利天主教大學先後派出百余名博士後經濟研究生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深造，他們回國後，積極宣導用新自由主義思想改造智利經濟。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等國都實行貿易自由化政策，加快國營企業私有化步伐，減少甚至取消國家對價格、匯率、利率、租金、工資等的全面干預和控制。同時，開放金融市場，放寬對外資的限制。這些國家照搬美國新自由主義理論，實行經濟改革，但阿根廷、烏拉圭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失敗告終。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代價。1976至1983年，破產企業增加了7倍，銀行業幾乎崩潰，失業率達30%，特別是金融政策的失誤，導致國家在80年代初幾乎無法償還外債，國家用80%的出口收入償債，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1982至1984年，智利先後更換了5位財政部長，新自由主義改革被迫暫時中止。

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一些國家實行民主選舉，新一代年輕政府領導人紛紛上臺執政，如墨西哥的薩利納斯、巴西的德梅洛、阿根廷的梅內姆、智利的艾爾文等等。他們大多在美國受過高等教育。以墨西哥為例，不僅薩利納斯總統曾在美國哈佛大學深造過，獲得了碩士和博士學位，而且其內閣中59%的部長或副部長也都擁有美國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智利艾爾文執政時，他的23位部長中，也有18

註十三：《文匯報》1999年9月10日。

註十四：法國《費加羅報》1999年10月6日。

位在美國大學獲得了博士或碩士學位，另有4人在西歐獲得了學位。他們在拉美一些國家成了擁有實權的“技術政治家”。（註十五）

1982年8月，墨西哥無力償還到期的100億美元外債，引發了1982-1983年的所謂“債務危機”，巴西、阿根廷、蘇丹、摩洛哥等40多個國家在這段時間內都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本金和利息。20世紀80年代初，發達國家以低利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債務服務。其目的是為本國商品尋找銷售市場並使債務國在經濟上依附於債權國。但從8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本國經濟的需要（抑制通貨膨脹），發達國家大幅度提高利率，例如法國的利率從1981年的2%提高到1997年的6%，從而造成發展中國家債務成倍增長。從1982年到1998年，發展中國家債務增加了三倍，從5千億美元增加到2萬億美元。（註十六）債務國利息不堪重負。

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債務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40%。拉美有些國家情況更為嚴重，其中最典型的國家是巴西，1999年的債務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69.3%。借助債務危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開始強制發展中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計畫，放棄國家對經濟的計畫和干預，放棄進口替代戰略和以內需為主的戰略，轉而為出口而生產，同時開放商品和服務市場以及資本市場。

8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為拉美國家接連開出結構性調整改革的藥方。1985年美國提出的“貝克計畫”就要求拉美債務國家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進一步開放資本和股票市場；放鬆投資限制，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實行

貿易自由化和進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稅收體系和勞動力市場，實行價格市場化，並以此作為債務談判的條件。1986年，墨西哥根據“貝克計畫”在外貿體制和公共部門管理方面進行了較重大改革，在債務談判中得到了較大的優惠，這就誘使其他拉美國家仿效墨西哥也採取相應的改革措施。而拉美一些國家在外資流入急劇減少的情況下，為從美國和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獲得更多貸款，被迫接受了某些結構性改革的附加條件。

這種得到美國政府和某些國際金融機構讚賞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全盤否定“進口替代”內向工業化發展模式，認為拉美債務危機的根源在於該地區實施了內向增長模式和保護主義政策，以及國家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過大和私人部門的相對軟弱。由此，主張減少國家干預和擴大對外開放，強調拉美國家必須採取如下改革措施：（1）實行對外貿易自由化，放棄鼓勵資源向國內市場傾斜的保護政策，採取鼓勵出口的外向發展政策，以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效益。（2）放開價格，取消政府對價格體系的干預。（3）縮小公共部門的規模，尤其要對生產領域中的大多數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4）國家應廢除有關法規和限制私人部門進入市場的障礙。（5）放鬆國家對勞動力市場的控制，開放金融市場，放開利率，取消政府對信貸機制的管制。（6）政府要努力消滅財政赤字，減輕稅收負擔等。（註十七）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後，這些國家新上臺的政府決策人員普遍依賴于美國的支持，而且原來大多是美國長期影響和培植的力量，他們全盤接受了新自由主義，在前蘇東國家實現了新自由主義轉型。90年代

註十五：陳才興：《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發展變化及其前景》，載《經濟學動態》1999年第3期。

註十六：托尼·安德列阿尼：《社會主義是未來》，法國西萊普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頁。

註十七：陳才興：《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發展變化及其前景》，載《經濟學動態》1999年第3期。

初，俄羅斯聯邦政府在自由主義激進派的推動下，制定了在500天內實現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計畫，即所謂向市場經濟過渡的“500天方案”，全稱是《向市場過渡——構想和綱領》。它要求在500天內在廣泛私有化和價格自由化基礎上實行迅速徹底的改革。葉利欽上臺後，又聘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制定了所謂“休克療法”，按照薩克斯的說法，其出發點就是：“盡可能快地創造自由市場體制，讓它開始運作，深淵不能分兩次跨過”。1992年俄羅斯聯邦政府將價格一下放開，居民的收入和儲蓄頓遭貶值。1992至1993年間實施的私有化，剝奪了絕大多數居民擁有和支配自己先前創造的國家財產的權利，這筆巨大的國有財產成為極少數寡頭統治階層一夜暴富的源泉。1993至1994年，在私有化浪潮的巔峰時期，由國家發行短期債券所構築的金融“金字塔”再次吞噬了居民的儲蓄和財產，使人民蒙受第二輪損失。俄羅斯“休克療法”的改革方案使俄羅斯成為國際資本的附庸。從1978年到1992年，70多個國家執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的566個結構調整方案。這些方案改變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把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完全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發達國家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 (1) 私有化

私有化在整個80年代飛速進行，到90年代初，80多個發展中國家已經對6800家國有企業實行了私有化。其中大多數都是從事公共服務（水、電、通訊）的國家壟斷性企業。由於這些國家的股票市場極不健全，國際大財團很容易購進這些公用事業的股份。後來在實行中

央計劃經濟的東歐國家也重演了同樣的一幕。到90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國家實行私有化的總價值高達580億美元。世界銀行高級經理大衛森·巴德霍在他的職位上服務12年離職時坦言：“我們自1983年以來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於這樣一種使命感：不惜一切代價將南方國家私有化。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變成了經濟上的瘋人院。”（註十八）

私有化削弱了國家作為生產資料直接擁有者和生產過程直接參與者的作用，如阿根廷梅內姆上臺執政後，就對電力、電話、航空、煤氣等國有大企業實行私有化，私人經濟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不斷加強。私有化首先造成腐敗盛行，削價出售的國有資產的回扣率往往高達10%。私有化改革由發達國家提供貸款援助，但實際上改革的利益落入少數金融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投資者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以阿根廷為例，在2002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私人境外存款高達1510億美元，而國家的外匯儲備僅有560億美元。自90年代中期以來，俄羅斯控制石油、金屬和其他利潤較高行業的金融寡頭已在國外帳戶上存了大約1600億美元，據特洛伊卡—迪亞洛格經紀公司透露，俄羅斯每年外逃的資本保持在200億美元左右。

私有化不僅導致腐敗，而且導致國內外大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大量利潤流入國內外資本寡頭手中。很多自然壟斷行業如鐵路、電力等被私有化後，服務並沒有改善，投資也沒有增加，但價格卻飛漲。自然資源的開發也被私有化，而這些資源往往是國家經濟的主要財源，現在也成為私人資產。有些企業被收購並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為了投機，從而造成企業倒閉，一些企業被外資收購也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為了消滅當地的競爭對手，因此當地企業往

註十八：阿蘭·G·納塞爾：《私有化是資本主義的趨勢》。

往被強行關閉。所有這些導致發展中國家國民經濟衰退，財政枯竭，無力支付公共福利甚至是政府員警的費用。

### (1) 價格的自由化

在私有化政策下，傳統由政府補貼的生活必需品如住房、食物、水、電、公共交通等部門，以及健康醫療和教育等基本福利部門等也都被私有化了。私有化後的結果是這些作為基本保障的部門的價格完全放開，結果並不是充分競爭然後導致價格下降，由於這些部門大多是自然壟斷部門，價格反而大幅上升，人民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從而又導致社會動亂。

### (2) 資本市場自由化

國際經濟機構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帳戶，讓資本自由進出。由於這些國家缺乏完善的監管機制，同時資本量有限，又往往採取和美元掛鈎的匯率體制，於是全球數以萬億美元計的大量遊資湧入這些國家投機，國家的外匯儲備往往很快被劫掠一空，而且造成持續的金融動盪。目前，國際資本市場積聚了7.5萬億美元遊資。它們使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時面臨

極大的金融風險。據1997年6月的統計，受東南亞金融危機衝擊的五個國家：韓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債務的62%都是短期債務，期限只有12個月。韓國的一半債務的期限低於90天。巴西60%的債務為短期債務，在1998年夏至1999年3月短短6個月貨幣危機中，巴西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減少了500億美元。（註十九）

### (3) 緊縮的財政政策和高利率、固定匯率的金融政策

根據貨幣主義的教條，擴大財政支出的凱恩斯主義政策是不可行的（雖然美國自己不斷這樣做），國家必須保持零赤字。這樣國家在

公共建設和教育等方面的長線投資就很難實施。新自由主義為了保證外資投資不至於損失，嚴格要求發展中國家保持幣值的穩定，因此往往要發展中國家儲備大量外匯，這些大量外匯大多存於美國的銀行或投資美國國債，利率很低。而能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長期收益的國內教育和基礎建設、產業投資卻得不到資金。

在金融動盪時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往往要求發展中國家仍然保持幣值穩定，於是不得不保持高利率和匯率穩定，這樣往往耗盡該國的外匯儲備，並且欠下大量外債。這些外債最後還是得由這些窮國的國民支付，而發達國家的投資和銀行卻隨時抽逃。這種安排實際上是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利益服務的。此外，為了克服金融動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要求發展中國家保持零赤字，這就必須削減公共投資和公共福利，從而減少了內需，造成市場疲軟，工廠倒閉，進一步惡化了金融環境。

### (4) 貿易自由化

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全面開放市場，而它們往往對自己的弱勢產業和部門如農業、鋼鐵等實行保護。發達國家對農民的補貼每年超過3000億美元，其中美國和歐盟提供的補貼最多。聯合國《2003年非洲經濟報告》指出：“美國在2002年5月作出的撥款517億美元以增加本國農業收成和補貼乳製品生產的決定使非洲經濟前景暗淡。這些補貼使美國農產品價格下跌，非洲弱小國家很難與之競爭。”（註二十）歐盟堅持對其甜菜糖生產給予補貼，導致非洲的產糖國陷入困境。對甜菜糖生產給予補貼是歐盟耗資甚巨的農業福利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消耗了它的一半預算。美國、歐洲和日本每天向其農民補貼近10億美元。全世界近10億人每天僅靠1美元艱難度日，而歐盟每頭牛

註十九：李其慶：《金融全球化的成因與特徵》，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4期。

註二十：《參考消息》2003年8月1日。

一天就得到政府補貼2美元。2002年發達國家對農業的補貼高達3200億美元，而它們提供的對外發展援助僅有500億美元。布希總統承諾將增加對外援助，隨後他簽署了一個農業法案，宣佈在10年內將提供1800億美元資助美國農民。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和農業補貼全部取消後，將使全球福利提高約1200億美元。而發達國家的大資本全面進入發展中國家後，往往短時間內沖跨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產業。由於迅速採用高新技術，傳統的工廠工人大量失業，而且他們並沒有能夠從低生產率的工作轉移到高生產率的工作，而是往往陷入長期的結構性失業。結果是自由貿易不但沒有消除貧困，反而加劇了貧困。

事實已經證明新自由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的這些強制調整已經導致嚴重惡果。

**(1)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發展中國家過分依賴外資。**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工業和技術開發部主任芭芭拉·穆爾斯等人指出，改革解決了一些老問題，但同時也造成了一些新問題。國有部門的投資效率低；外資與國內經濟未能結成一體，其結果是貿易赤字擴大，越來越依靠外資。一旦外資撤離，經濟就陷入困境。阿根廷20位宗教界人士致信阿根廷領導人指出，新自由主義政策“把我們拖進了沒有希望的境地”。

**(2) 新自由主義造成財富分配不均。**前智利總統派特里西奧·艾爾文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不能消除拉美日益嚴重的社會災難，因為市場“常常是非常殘酷的，它有利於最強者，而加重最貧困者的貧窮”。他依據智利的經驗指出，“市場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市場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它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拉美左派組織“聖保羅論壇”也在一份檔中指出，新自由主義改革使財富空前集中，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邊緣化和貧困化。

**(3) 新自由主義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學者卡洛斯·M·維拉指出，“新自由主義沒有社會政策的地位，全靠市場統治一切。”在新自由主義模式中，“社會問題被看作是一個支出領域：『社會發展』的概念讓位於『社會補償』，充其量是補償或緩解經濟政策造成的後果”。政府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取消社會福利體系，從而失去了緩和社會緊張的作用。

**(4) 從國際範圍看，新自由主義由於缺乏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計畫，無法全面促進世界經濟發展。**非洲的邊緣化，亞洲金融自由化的消極後果以及拉美的經濟和金融動盪等等，都是證明。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核心是盡可能弱化國家的作用，主張市場對經濟的絕對統治。新自由主義大談“民族國家和國家主權失去意義”，要求發展中國家減少對經濟的干預，把有關主權讓渡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新自由主義表面上推行市場自由化，實質上是圖謀讓強國擔負起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的任務，阻止弱國擁有保護自己市場的機制和手段，保證其企業對弱國市場行使霸權。很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拉美國家“虔誠而認真地弱化國家”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西方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本質不過是通過對國家政策的國際性調整以達到收入的再集中而已，有的指出，拉美的自由化政策實際上“不過是拉美資本家與美國政策制定者、銀行家和跨國公司結盟的產物”。拉美學者還批評新自由主義將市場的作用理想化，片面強調開放市場，否定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通過各種管道使國家喪失財政能力，從而逐漸失去生產性投資和社會投資的功能。拉美的一些工會組織認為，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削弱國家主權，有利於跨國公司而不利於工人，社會代價巨大，有的學者指出，

“新自由主義藥方對拉美無效”，世界經濟目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是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和政策密切相關的。市場自由化和減少國家對經濟、特別是對金融部門的控制，沒有導向一個更加自由的市場，相反卻促進了市場、特別是世界金融市場的壟斷化。其結果是窮國被迫服從于富國的經濟利益，成為後者資本擴張的犧牲品。（註二十一）

1980年以來的20年，拉丁美洲普遍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人均收入卻僅僅增長了7%，而此前的1960-1980年一段時間中，政府對經濟有更多的干預，人均收入增長了75%。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貧富兩極分化也日趨嚴重。據統計，全球最富裕國家人均實際收入與最貧窮國家相比，已從1800年的3:1，1900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60:1。2002年全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6000美元，最富裕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達2.9萬美元，而最貧窮國家人均只有500美元。全球財富分配也十分懸殊，其中高收入國家10億人口擁有的財富占全球財富的60%，中等收入國家15億人口佔有的財富占全球財富的20%，低收入國家35億人口佔有的財富僅占全球財富的20%。世界銀行《2003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20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貧困的20個國家的37倍。聯合國確認的最不發達國家已由1974年的19個增到2002年的49個。最不發達國家的貧困化問題極其嚴重。根據聯合國的標準，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為貧困人口，不足1美元的為赤貧人口。目前，世界人口約60億，其中貧困人口近28億，約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赤貧人口約15億，占世界人口的1/4。這種赤貧化現象在最不發達國家最為突出，其赤貧人口已由20世紀

60年代後期的138億增加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3.07億，赤貧人口占其總人口的比重也由1965-1969年間的48%上升到1995-1999年間的50%。

貧困現象在世界上的分佈是不均衡的。1998年，人均日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的赤貧人口有12億，其中南亞占43.5%，撒哈拉以南非洲占24.3%，東亞太平洋地區占23.2%，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占6.5%。世界上49個最不發達國家中非洲有34個，其赤貧人口達2.91億，占其總人口的52%。尤其在農村，59%的人每月生活費用只有14美元。此外，非洲還有810萬難民流離失所，2300萬愛滋病患者和病毒攜帶者，2億人口長期營養不良。

## 六、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趨勢

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趨勢主要受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它的內部自身矛盾的發展；二是它的外部發展環境。

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超越：“凡是不抱偏見的人都能看出，新自由主義者對現實的經濟過程和政治過程的認識並不是從凱恩斯主義後退，而是從那裡前進。他開始弄清了市場失敗和政府失敗的真正原因，並把握了市場與政府間的結合部位，從而使二者相輔相成，各得其所。因此，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比新古典學派和凱恩斯主義更優越的理論。凡是歷史的真實的進步都有意無意地遵循著『否定之否定』的路徑發展的，因此，否定之中就寓有否定物件的一切合理因素。”（註二十二）新自由主義針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新的矛盾，適應資本主義走出困境的需要，揚棄了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某些不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東

註二十一：姜時學等：《拉美反思新自由主義》，載<http://www.cReader.com>2001-08-29/。

註二十二：李任初：《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37-238頁。

西，對資本主義擺脫危機、繼續擴張產生了一定作用。但是，從本質上看，它實際上是古典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兩者的綜合。因此，它沒有也不可能克服兩者都包含的並制約其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經濟學上，這一矛盾就表現為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無法解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正如美國學者阿蘭·G 納塞爾深刻而又生動地描述的那樣：

“新古典綜合理論內部各要素之間是不協調的。處於核心的是微觀經濟學（研究在雜亂的市場上價格是如何確定的），它的主要出發點仍然是古典主義的：完全的競爭是典範，以個人為中心的市場會趨向於均衡。

“在加進偽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研究作為整體的經濟發生變化的決定因素，如總價格、就業和產出的變化等）時，這些古典主義假設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但是這種宏觀經濟學的定義卻不能從微觀經濟學的命題中推導出來，因而不能與微觀經濟學相融合。這個理論齟齬並不奇怪。宏觀經濟學之所以是凱恩斯主義的，是因為它承認，當價格機制集合進作為整體的經濟時，商品和服務的供給數量並不必然與需求的數量相平衡。在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完全有可能產生出一種達不到勞動力和生產能力的供給水準的有效需求。

“凱恩斯主義對這個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政府有必要實行需求管理，這能夠保證可得到的勞動力的就業，有效地利用非人力的生產能力，預防因長期失業而導致的政治動盪。這一點正是齟齬之所在。承認如果要利用全部現有生產資源就有必要進行政府干預，這就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觀點發生了矛盾，因為微觀經濟學鼓吹，不受控制的價格機制，自由市場，

足以生產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微觀經濟學沒有任何支持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古典基礎也明顯是相抵觸的。宏觀經濟學與已得到公認的新古典主義智慧和新興的新自由主義共識是不相容的。”（註二十三）

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以及它們的共同基礎——私有制經濟學決定了它們之間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補充。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也有共同之處。為了資本主義“千年王國”的長治久安，兩者都主張階級調和。所不同的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後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兼顧了經濟的增長和工人的利益，同時培育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保護層——“中產階級”。而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則無法維持這一局面，在階級力量對比明顯地有利於大壟斷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只能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保全大壟斷階級的利益。

從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內在矛盾來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既不能實行純自由經營政策，也不能實行純政府干預政策。可能的情況是，在這一時期強調自由經營，在另一時期看重國家干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徹底改變之前，自由經營與國家干預這兩種思潮相互交替，會反復出現。不過，無論哪一種經濟思潮得勢，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失業、通貨膨脹等種種資本主義的痼疾，而只能暫時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註二十四）

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也受到外部條件的制約。一方面，大壟斷資產階級和右翼勢力利用它們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優勢，特別是利用它們在經濟全球化中佔據的主導地位，大力

註二十三：阿蘭·G 納塞爾：《私有化是資本主義的趨勢》。

註二十四：傅殷才：《新保守主義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頁。

推行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它們也遭到了本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抵制和反對。這場鬥爭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全面展開。新自由主義首先遇到的是西方左翼學者對它們的揭露和批判。這些學者不僅站在本國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的立場上，而且站在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立場上說話。西方左翼學者主要分佈在各大學和科研機構，他們擁有數百家刊物如英國的《新左翼評論》、《今日社會主義》，美國的《科學與社會》、《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每月評論》，法國的《思想》雜誌、《外交世界》、《當代馬克思》雜誌等等。他們還經常舉行各種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為主題的研討會。這些活動有很大影響，甚至影響到部分主流派學者，例如在他們的影響下，法國社會黨饒勒斯基金會和主流派經濟學家弗朗索瓦·貝魯的研究小組都對新自由主義採取不同程度的批判態度。其次，新自由主義遇到了發達國家共產黨、工會組織和其他左翼政黨，其中包括主張社會改良即所謂走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民主黨的中左派別的抵制和反對。法共在2000年舉行了“全球

化與人類解放”國際大會，提出用“公民世界的全球化”代替“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的號召。最後，新自由主義還遇到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社會進步力量的抵制和反對。從1999年11月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到2003年1月28日第33屆世界經濟論壇，非政府組織在3年時間內至少組織了21次大規模反全球化遊行示威。2002年1月31日至2月5日，世界經濟論壇在美國紐約召開，與此同時，反全球化的世界社會論壇在巴西召開。150多個國家的勞工組織、農業工人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代表6萬多人出席了會議。世界社會論壇反對“由自由市場控制”的全球化，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過分做法導致的災難、不平等和不公正現象”。宣言主題是“為了抵制新自由主義、軍國主義和戰爭”。

新自由主義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將是一個長期、複雜和曲折的過程，其發展趨勢將取決於影響雙方力量對比的各種因素。◎

轉載自：<http://www.maoflag.net>

# 感受你熾熱的心

本刊創刊後承蒙各界捐款贊助，謹申深摯的謝忱。

葉芸芸	500美元	台中一教授	5000元
梁先生	16000元	王津平	5000元
金寶瑜	11600元	陳映真	5000元
吳俊宏	10000元	張敏生	5000元
新莊一醫師	10000元	鍾先生	3000元
張星戈	5000元		



# 權力資本家化 和資本家權力化

中國大陸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實行經濟改革後，權力商品化的情況即日益嚴重，九〇年代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更加速了官商一體、政商不分的官僚資本主義化，資本家轉化為官僚，官僚轉化為資本家，政商之間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江澤民在中共建黨八十周年之際提出允許資本家入黨，曾引起黨內極大的非議，但更嚴重的其實是大批黨員幹部已資產階級化。大陸學者王巧麗以安徽省的實際案例，深入分析了官商一體造成的惡果，極有助於我們瞭解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共的蛻變趨勢。■□編者

文■王巧麗

**新**民週刊1日刊載文章說，四川省委組織部最近的一則舉措大快人心。該省近日清理出423名下海辦企業的公務員，要求這些雙重身份的“官商”在限定時間內做出去留選擇。人們在拍手稱快的同時往往忽視了一個細節：省委組織部還廢除了該省25個允許國家公務員經商辦企業的地方性文件和辦法。這意味著，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期內，這25個地方性文件和辦法都具有合法性，曾經冠冕堂皇地鼓勵亦官亦商。

安徽省界首市市長王顯義不久前還是“官商”隊伍中的一員，以市長的身份兼任該市瀕臨破產的沙河酒廠廠長。蕪湖市市委書記詹夏來也是頗受矚目的“紅頂商人”。他現在仍然以市委書記的身份兼任國有企業奇瑞汽車的董事長。面對雙重身份引發的爭議與批評，不知

詹夏來心中是否有和王顯義類似的困惑。

## 官商融為一體

當“官”與“商”都突破了自己的界限，“把兩個泥人打碎”之後，就變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畸形關係。這種關係會演化出一種潛規則，使得政界與商界的其他競技者只剩下三種選擇：追隨，出局，或者繼續鬱悶而艱難地參與遊戲。我們甚至還看到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兩位一體”，表現為公務員經商，或者商人直接從事公務。乍看之下，“兩位一體”，既有冠冕堂皇的形式，又有“制度”一旁護駕。

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明白，這種做法其實更加危險，它剝奪了競爭中的公平，還連帶剝奪了人們懷疑與抗議的權利。而這種剝奪是

被披上合法外衣的。但現實是紛繁蕪雜的，歷史演進的軌跡也並非那麼清晰。我們給大家的不是充滿道德感和責任感的檄文，而只是兩個當事人一段平平淡淡的故事，一段甚至難以貼上“對”或“錯”、“好”或“壞”標籤的往事或者現實。不是黑，不是白，這是一個灰色的歷史斷面。

王顯義本來是做企業的，無心走仕途，卻仍把一隻腳踏了進來，還被推到了市長的位置上；當他希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時候，又被拉去管理企業。最後，當他懷疑自己是否更適合做一名“全職企業家”時，組織再次明確把他定位為“官員”。

7月23日，王顯義告訴記者。前些天，中紀委的同志剛來找過他。中紀委的人來了，到市財政局查賬、到沙河酒廠查賬，還詢問了包括沙河酒廠現任廠長、界首市市委書記在內的不少人。

王顯義受到調查的原因是政商兩棲。2002年2月，他以安徽省界首市市長的身份兼任該市沙河酒廠廠長，2003年3月辭去廠長職務，不再“腳踏兩隻船”。他本來以為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了，不料又在2003年下半年被人翻了出來，成為媒體議論當前“紅頂商人”現象時不會繞過的反面例子，並且驚動了中紀委。

## 官商不分的兩種情況

安徽省《決策諮詢》雜誌社的孫東海副主編說，安徽省的“官商”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國有企業或私營企業老闆做得比較好，政府為了獎勵給企業老闆所謂的“政治待遇”，讓他們在政府中兼職。還有一種就是政府領導人兼任大中型國有企業領導人。一般來說，大中型國有企業不僅是當地的財政支柱，還關係到成千上萬工人的就業。當國有企業遇到無法解決的難題或陷入困境中時，由當地政府領導人親

自出馬，希望“挽大廈於將傾”。

界首市原來有3位“官商”知名度比較高：除了市長本人曾兼職沙河酒廠廠長之外，還有一個是界首市民營企業天安集團董事長張超彬兼職市政協主席；另一位是分管工業經濟的副市長彭傑兼職碧泉集團董事長。但如今橋歸橋，路歸路，這3個人都不再擁有“雙重身份”了。張超彬到了年齡已經退休，彭傑則不再擔任政府職務，一心一意做企業去了。

7月中旬，一則消息在安徽省蕪湖市不脛而走，並在當地的政界、商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中紀委找過詹夏來了。詹夏來是蕪湖市市委書記，兼任奇瑞汽車集團董事長。據瞭解，中紀委此次南下安徽，也正是衝著包括詹夏來在內的一些具有“雙重身份”的黨政幹部來的，主要調查這些幹部是否違反了《公務員暫行條例》中“公務員不得經商、辦企業以及參與其他營利性的經營活動”、是否以權謀私並製造不公平競爭。

同時，在海內外媒體對政商關係的報導與評論中，“詹夏來”這3個字儼然成了“官商”與“紅頂商人”的代名詞。這位蕪湖黨委“一把手”、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兼“奇瑞奇跡”的締造者，再一次被推到了聚光燈下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安徽省政府工作人員說，關於詹夏來的話題十分敏感，一是因為詹夏來身居政府要職，不好輕易評價；二是因為他本人確實很難被簡單概括和歸類。

這名工作人員說，詹夏來的公眾形象幾乎和蕪湖的另外兩位名人——“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九和“小燕子”趙薇一樣受到爭議。但他認為，從蕪湖市的經濟發展和奇瑞汽車的發展上，就可以看出此人能力強弱、實幹與否。近年來，蕪湖的GDP增幅一直在14個百分點左右，是安徽全省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

## 中共將和平地蛻變成 “有錢人的政權”？

假如一個省的省委書記同時兼著企業大集團的董事長（“權力資本家化”），假如一個民營企業家還兼著省長的角色（“資本家權力化”），假如以上兩個“假如”還成為一個地方發展的一種趨勢，那麼，這三個“假如”的成立還真值得我們的政治家、社會學家拿出來討論討論！

這“三個假如”成立首先意味著：儘管中共中央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今發了數十個關於“嚴禁黨政機關幹部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黨政機關幹部不兼任經濟實體職務”等文件、通知，但是，你發你的文件，我該經商時還是經商，該兼職時還是兼職，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這“三個假如”成立，還意味著它從根本

上簡化了當今社會腐敗的程式和手續。腐敗就其實質來說就是“權力資本化”。傳統的腐敗，權力還要進入市場交易，還要有錢的企業家出錢去買權力，還得要一個過程和程式，如果當權者直接變成了資本家了，手續就“簡化”了。只要他本人願意，就可以通過制訂政策來“兌現”權力；只要他本人想富，就可以通過種種的政策傾斜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富人。我們的有些當權者實在是聰明得很！

這“三個假如”成立還意味著：我們的政權將慢慢地、不知不覺地、和平地蛻變成“有錢人的政權”。這樣說是不是有點太武斷？非也。這種體制演變的問題還不僅僅是“權力資本家化”，更厲害的還是“資本家權力化”。◎

【作者：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特約研究員】

轉載自：<http://www.gongnong.org/bbs/>

1870年從法國大量傳入的貪污腐化風氣，以空前的速度大規模地散佈著。施特魯斯堡和貝列爾互相脫帽致敬。大臣、將軍、公爵和伯爵，同最狡猾的交易所猶太經紀人作投機競賽，而國家也承認他們的平等身分，把交易所猶太經濟人大量地封為男爵。很早以來就以糖廠主和酒廠主身分從事工業的農村貴族早已忘了尊貴的昔日，現在都把自己的名字列入殷實的或不大殷實的股份公司經理名單中了。官僚愈來愈輕視把盜用公款作為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們把國家公職置之腦後，一味追逐收入更多的管理工業企業的職位，而那些還留任國家官職的人們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樣搞股票投機，或“加入”鐵路或諸如此類的企業。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認為：就是尉官們也並不反對搞些投機事業來發點小財。一言以蔽之，舊日國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劇地解體，專制君主國在急劇地過渡到波拿巴主義君主國；在行將來臨的工商業大危機中，不僅現代的騙局要被揭穿，而且整個舊日的普魯士國家都要崩潰。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

代序：

# 紅色客家人

■藍博洲

**從**大陸原鄉移墾台灣的歷史過程中，台灣的福佬系與客家系漢人，有過無數次因為經濟利益的衝突而形成的械鬥。歷史的傷痕使得一些抱持「大福佬沙文主義」者至今仍抱著無知的偏見。他們認為，台灣的客家系漢人大多是「保守、膽怯、馴迎權力、附庸政權的義民」。……

然而，個人主觀的偏見並不能成為歷史的客觀事實。

台灣客家系漢人的政治性格究竟如何？顯然還得通過台灣歷來民眾抗爭史的研究，才能得到比較接近客觀事實的認識。

遠的不談，就從一八九五年台灣割日談起吧！

## 南北二路客家民眾的武裝抗日游擊戰

五月廿五日上午，客籍士紳丘逢甲(工部主事)首先率領有志紳民謁請台灣巡撫唐景嵩，共組「台灣民主國」，發表「抗日宣言」，以期「各國仗義公斷，能以台灣歸還中國」。

五月廿九日下午，日軍主力近衛師團第二聯隊從三貂灣澳底與鹽寮一帶登陸。

六月四日，唐景嵩潛逃廈門。

六月七日，鹿港籍福佬人辜顯榮引導日軍

先頭部隊進佔台北城。

六月廿二日，日軍在大砲掩護下攻佔主要是客家人居住的新竹地區。

據日本征台文獻記載，相對於兵不血刃地攻佔台北城，日軍卻在今三峽大溪中壢龍潭新竹大湖一帶的客家庄落，遭遇到武器粗陋的民眾武裝游擊的強悍抵抗；其中包括無數客家婦女也參加戰鬥，犧牲戰場。樺山本部因此大為震驚。

十月十一日，日軍第二師團自屏東枋寮上陸，東港士紳不戰而退。這時候，夙有軍事防禦歷史經驗的客系農業宗族公社——六堆各堡，早已組織了民眾武裝的聯合義軍，力戰來犯日軍，並在茄苳腳和頭溝水兩地展開尤其猛烈的戰鬥。據載，客籍婦女和兒童也都參加了戰鬥，使日軍付出巨大代價後才得在五天後進佔鳳山。為此，日軍展開火燒村舍的報復；今六堆長治鄉有名為「火燒庄」之地便是據此而來。

一九〇二年五月，世居阿猴街的客家人林少貓領導的反日義軍在鳳山後壁林一帶被殲滅；台灣人民反抗日軍佔領的武裝抗日游擊戰終於告一段落。(註一)

## 辛亥革命前後客家民眾的反日起義

隨著滿清封建王朝的腐敗無能與孫逸仙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大陸蓬勃展開，辛亥革命前後，殖民地台灣也先後爆發了十二次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日民族起義事件。台灣的客家系漢人不但沒有在這個階段的反日鬥爭中缺席，其中，以客係人民為主，一九〇七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起義和一九一三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更是規模和影響較大的幾次事件。特別是羅福星事件，它不但具有現代反日

註一：詳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上卷)》；王洛林總監譯《台灣抗日運動史》，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八月初版。

民族主義的思想，而且將台灣的反日民族鬥爭與中國大陸的國民革命互相連結起來。（註二）

## 台共指導下的客系農民反日鬥爭

台灣民眾反日的「武鬥」階段在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後結束。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台灣進步知識份子和開明士紳組成最初的全島規模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有計劃地推動文化啟蒙運動。台灣人民的反日鬥爭進入以現代文化、思想和社會運動進行的「文鬥」階段。

從史料上可以明顯地看到，在文化協會以降的右翼運動的政治光譜上，在台灣社會中廣泛地分配在「佃農·傭工」階級的客家人，的確是相對地黯淡無光；然而，在左翼的、台灣人民階級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重要環節的「農民組合」中，客家系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份子卻留下令人驚嘆的、英勇鬥爭的事蹟。例如：

一九二七至二九年間，日本拓殖公司的五百餘名佃農在農組幹部的領導下集會請願，要求減租，卻被日警鎮壓檢舉，造成台灣反日運動史上著名的兩次「中壢事件」。（註三）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急速發展中的農民組合遭到日警的全面檢舉。「二·一二」大檢舉後，重建的農民組合在反帝抗日的農民階級運動上日益地下化和激進化，而與當時台灣地下抗日民族解放勢力的台共產生日形密切的關係。同年十一月，苗栗大湖年輕的農民階級戰士劉雙鼎扛起重建「大湖支部」的歷史任務。一九三〇年，劉雙鼎參加了農組北部支部聯合會，進一步接受屬於文協左翼的苗栗街客

籍知識份子郭常的指導，展開各種組訓和潑辣的農村鬥爭；「大湖支部」成為貧窮山村中佃農抗爭活動的核心。同年八月，農組進一步宣告為台灣工人階級堅定的同盟軍。一九三一年五月，台共通過一項提綱，指出日帝對中國滿蒙的侵略，打開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國家間國際戰事的序幕；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將以日本參與其中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為重要契機。為了打倒日帝，在台灣建立工農人民的政權，台共號召台灣共農階級，做好武裝革命的準備。劉雙鼎響應台共準備武裝革命的號召，於是在三灣庄永和山，正式建立「永和山支部」。「九·一八」事變勃發後，農組認為，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發展，勢必促成台灣人民抗日民族解放鬥爭之勝利；「永和山支部」也受命在中日戰爭深化時刻發動武裝蜂起。然而，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發展，日本特務機構對台共和農組的鎮壓也相應加強。一九三二年二月，台共份子遭到大檢舉，勢力頓挫；三月，郭常被捕。在一片白色恐怖氣氛中，劉雙鼎仍然無畏地繼續活動，準備武裝蜂起；最後終於在九月被捕。劉雙鼎落網後，日本特警在新竹州各客家庄展開全面徹底的搜捕，前後計有百餘名客家農民牽連入獄。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協左翼客籍知識份子鬥士郭常獄死；第二年（一九三四年）十月，客系佃農階級戰士劉雙鼎也在嚴酷的刑求下瘐死獄中。（註四）

隨著郭常、劉雙鼎的先後被捕與獄死，台灣共產黨指導下農組永和山支部的武裝蜂起計劃，終於落幕。台灣左翼運動的第一週期也告

註二：蘇新《憤怒的台灣》（頁五九—六〇），台北市，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初版一刷。

註三：詳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之治安狀況（中卷）》；林書揚總監譯《台灣社會運動史（IV）·農民運動》（頁九六—九九），台北市，創造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一版。

註四：前引《台灣社會運動史（IV）·農民運動》，頁二三四—二三六；《台灣社會運動史（III）·共產主義運動》，頁二七八—二九六。

一段落。

## 台灣左翼運動第二週期的紅色客家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台灣重歸中國。

台灣左翼運動進入第二週期。

一九四八年後，國共政治鬥爭在台灣蔓延，中共系地下組織迅速在舊農組活躍過的、廣泛的桃、竹、苗貧困客家農村中發展。台灣客家系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份子毫不猶豫地投入第二週期的台灣左翼運動，並且作出重大的貢獻與犧牲。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派任台籍幹部蔡孝乾(彰化人)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九月，蔡孝乾由延安出發；間道潛行三個月，於十二月始抵江蘇淮安，向中共『華東局』(原稱華中局)書記張鼎丞及組織部長曾山，洽調來台幹部。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幹部張志忠(嘉義新港人)等，分批到滬，與華東局駐滬人員會商，並學習一個月。四月，張志忠率領首批幹部，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六月廿六日，蔣介石對中共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中國全面內戰爆發。)七月，蔡孝乾潛台，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任「書記」，領導組織；張志忠擔任「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的工作(後交由陳福星領導)。(註五)

陳福星，台南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據下州立台南二中第七屆畢業，就學日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返台；一九四六年擔任台南鳳梨

公司第三廠代廠長，因不滿政府官員的腐敗，常與同學李義成討論時政，並由李介紹，認識日據時代農民組合幹部李媽兜，再由李媽兜介紹給蔡孝乾；同年秋，由蔡孝乾吸收入黨；十一月，奉命與李媽兜、陳文山成立「台南市工委會」。後來，陳福星轉任台南新豐農校校長，蔡孝乾於是介紹林英傑(廣東人)等多名幹部到該校任教。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林英傑身分暴露，被警察圍捕；陳福星潛逃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處，秘藏三天，再轉中壢義民中學姚錦(黎明華)處……；一九四八年春，奉命領導新竹以北所有組織，先後領導客籍幹部曾永賢(苗栗銅鑼人)、劉興炎(竹東人)、林希鵬(苗栗人)、黎明華(廣東梅縣人)、蕭道應(屏東佳冬)及黃培奕(台北鶯歌人)等，積極展開活動。(註六)

一九四八年四月間，陳福星吸收苗栗頭份流水潭青年劉雲輝，參加地下黨組織。(註七)「台灣省工委會」所屬「竹南地委會竹南區委」成立後，劉雲輝擔任「區委書記」，陸續在南庄、三灣、大河底、竹南、頭份建立基層機構「小組」。(註八)

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台地下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領導機構被瓦解；當時人數尚不滿千人的黨人，以及無以數計的民眾，在全省各地陸續遭到被捕殺的厄運。(註九)

據《安全局機密文件》所載，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客系人士或客家地區的「涉共」案件至少包括：「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所屬基隆中學案、鐵路組織案、竹東水泥廠案、楊梅支部案、松

註五：《安全局機密文件》(上)，頁一二，李敖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初版。

註六：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二〇四。

註七：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三八六。

註八：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四四。

註九：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上)，頁一七、一八。

山第六機廠案、竹南區委會案、苗栗油廠案、中壢義民中學案、佳東支部案、銅鑼支部案……，以及苗栗治安維持會案、台盟竹南支部案、社會主義青年大同盟案……等幾個大案。據非正式估計，此一時期的赤色政治犯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台灣客籍人士。

一九五〇年五月，以陳福星為中心之北部台共組織已設法與中共中央取得聯繫，接奉「中共中央一九五〇年四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幹部，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開始重整組織；至該年年底，全省各地黨組已再具規模，隨即發出「一九五〇年工作總結」，檢討過去失敗教訓，具體指出以後工作方針，再度展開活動。一九五一年春，陳福星與流亡在桃、竹、苗山區之黨人——曾永賢和黎明華，重建了黨的領導機構，以「在勞動中求生存、求生活、求安全、求工作」的原則，團結、教育了客家山區的農民群眾，並逐步建立了隱蔽的「據點」和「基地」。（註十）

一九五二年四月下旬，位於三義鄉魚籐坪山區的領導機構被破壞；領導人曾永賢、蕭道應和陳福星先後被捕。（註十一）

此時，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台灣正式建立的「台灣省工委」系統的組織，徹底瓦解。然而，一些倖免被捕的客籍黨人及農民群眾們，依然在銅鑼、三義、大湖、獅潭和三灣一帶的山區流亡與工作。

據官方檔案所載，劉雲輝隨即繼曾永賢之後，擔任「苗栗縣臨時縣工委會負責人」，將苗栗地區殘存組織整理為「三個互助組」，堅持地下活動……。但是，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下，這些左翼的革命者們終於還是陸續遭到折翼的命運。一九五三年三月，劉雲輝在苗

栗頭屋鄉山區扒子崗被陳福星等人策動，出來「自首」。（註十二）

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其餘黨人隨後也陸續出來「自首」……。

### 藍的、綠的與紅的……

綜觀台灣史上客系人民抗爭運動所表現的政治傾向，階級性至為明顯。從滿清割台、日軍登陸以來，丘逢甲、羅福星除外，客系民眾的抵抗運動鮮有鄉紳士大夫地主階級的領導，大多皆為貧困農民的蜂起；因此，其決心、義氣、勇氣、堅定性、徹底性及進步性也高。譏嘲客系台灣漢人是「保守、膽怯、馴迎權力、附庸政權的義民」，揆諸史實，誠為不足為訓之偏見。

最後，就語言的腔調而言，台灣的客家話的確有所謂四縣、海陸、詔安……等不同腔調之分；但是就社會構造而言，台灣客家社會內部之真正區分應該還是階級之別。語言的腔調不同並不能妨礙同一階級的人們互相溝通；但是，階級屬性的不同，卻總是讓同操某種腔調語言的人們，互為陌路，乃至對立。就世俗的顏色論而言，光復以來，台灣客家主流社會的封建大老們，在色譜上一直都是藍色的；近幾年來，隨著政權的易位，附庸綠色政權的客家大老已成為台灣客家社會新的主流代表。然而，歷史告訴我們，除了附庸藍色或綠色政權的義民之外，以工農階級為主的廣大客家民眾，向來卻是高唱紅色的歷史戰歌的！

《紅色客家人》一書所輯的便是黎明華、劉雲輝、張南輝、羅坤春、謝其淡和蕭道應等客籍折翼黨人所經歷的一段不為人知的革命故事。◎

註十：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二〇五、二〇六。

註十一：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二一七。

註十二：前引《安全局機密文件》（下），頁三八六一三九一。

# 霜降 (三)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 四、北所

**台**灣海峽，如以直線計算，平潭到淡水約一百哩，廈門到安平約一百四十哩，舟山列島則更遠。如以美式登陸艇，平均時速五哩計，大都需要在發動攻擊前二十四小時出發。即使風平浪靜，仍要經過一段白天。所以，中共如要發動對台灣的攻擊，尤其要動用傘兵，一定要控制空權及海權，而控制了空權就等於是控制了海權。

以攻守之勢來說，台灣是易攻而難守的島嶼。河流太多，嘉南平原最寬處也只有五十公里多一些，而也自淡水、八里、桃園（竹圍、許厝）、香山、後龍、通霄、梧棲、線西、和美、布袋、灣裡、枋寮到東北的澳底，都適於登陸。大甲、大安、大肚、濁水等溪的橋樑也容易破壞。

問題是中共有無這一控制空權的能力。米格十五出現於上海的虹橋機場，並不保證有此一能力。數量及駕駛員的素質，是很重要的因素；而且還是一個未知數。

就時間來說，五月中旬是滿潮，日出時間五點十分左右，是一個適當的日期。但排在長江的舟艇並沒有動靜，空軍也沒有動靜。六月十六、十七的第二次機會也過去了。

有種種原因影響到上面的吧：吳石案（註十）及沒有指揮大軍渡海的經驗。究竟第一波四個混合師，加上一個傘兵師，要用多少艦艇和運輸機？這種參謀人才，可能連蘇聯也難找。當然在留用的日軍參謀中去找是可能的。

全部投入的兵力要二十個師，這是最少的估計，這一補給的船隻是個大問題。

就算這不是對德國、日本的登陸戰爭。土法在金門試過，碰上換防，有兩倍軍力，被殲滅了。（註十一）如雷州半島用機帆船，發動對海南島的那一套，對台灣是不能適用的。當年六月六日，諾曼第作戰，第一波登陸的四個師，動用的艦艇上千。（當然也包括了第二波、第三波吧。）

如果美國一翻臉，這個場面是甚難的。五月、六月，最好的時期都過了。七月後颱風常到，八月也如此。照理說，台灣海峽如台諺：「二、八好行舟」。到農曆八月還要三個月，如何變，這是任誰也不敢輕估的變數。我內心還感到，近來美國官員不尋常的到日本、南韓，極可能就是求變的一股潮流在那裡滾動。

想辦法在外面避一避是做得到的。只要讓大妹回故鄉後，在兵亂時離開學校，就不會被人家存疑。而在靜的局面，我反而不能動。算是愚笨不化也好，死心眼也可以。衡量一切，我只好等待萬一的機會，自然地拖到學期結束。落到這一下場的可能率，早已算好，難得有僥倖的機會。

如果當初不轉醫學院，畢業考早完了，現在可能已流浪到南部山區的邊緣。這就是許多偶然堆成的必然了。我在台北帝大預科是唸工類的。當父親知道我不是考醫，而以工類為志願時，隨手就拿起燒火的兩寸粗的木條，打我的背部。想不到光復後，教務長富岡教授卻那

註十 ◆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以「匪諜」之名被捕，八月十九日槍決。

註十一 ◆ 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解放軍發動金門島戰役，因為缺乏船隻支援而失敗。



麼輕易地讓我轉到醫類。如果我唸化工，這時候真的不會遇上葉盛吉，也考完了畢業考試；如果唸化工，我就可能如中學那樣認真，不會浪費時間，也不可能讀那麼多的書。極可能如小學、中學時，只有那麼幾個有限的朋友。

不過，這一假定也難說。我可能如K沒有事，不過也可能如石玉峰踏上流浪的路。歷史不適用假設兩字。即使走上石玉峯的路，仍是崎嶇的。我知道，淡水和布袋兩個逃亡的路線，去年秋天就斷了。這封閉的三萬數千平方公里，真是很難找出一塊寄存六尺之身的空間。不過，就可能性來說，如讀工學院，我以同情社會主義運動的旁觀者而走上K的路的機率較大，是可能的。但多餘的假設，徒然增加多餘的心理負荷，對現實反而是負面的效果比較大。

人生就是如此，歷史也是如此；兩者的際會，展開無限的事項的流程。也不必說一七九三年，站在斷頭台前，說了「自由、自由，多少的罪惡，假你的名而行。」（註十二）那是肯定自己生命的歷史價值的執著。中國人看得開，「士為知己者死」是一種型態，如譚嗣同因天真地搭上袁世凱這一條路，及至事敗，內心可能甚是懊悔，而自己選擇了死亡。對生命的附註，如魏徵的「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也充分；如傑弗遜的「我倒願意在生命該熟透而墜落的時刻，便該消失。」那也可以。

當然，我這個時候仍是青澀的人生的開端。自古以來多的是「花開風雨時，人生足別離。」如某位前輩，也是一世奇才，但身患糖尿病及肺結核，父親是一個國小的校長，他卻選擇了死亡。當年多少抱負，多少熱情，這歷

史和內心的風暴使無數的傑出人才，英年早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抗德中的法國，從辛亥革命到抗日的中國，其激烈的鬥爭過程中，多少瑰麗了花蕾，在未開時就在風雨之中凋謝飄零。

就算是保住一命，我的生命的軌跡也已經顯然不同了。起碼不必再當我所厭惡的沒有假日，沒有晝夜，沒有屬於自己的天地，沒有屬於自己完全可以支配的時間的醫師。不過又要選擇什麼呢？萬萬想不到這時候心內的一個猶豫，以後竟影響了我的後半生，成為不大稱職的醫師。

天亮以後，我才知道，牙刷、毛巾、草紙、買早點的錢、換洗的內衣褲，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只好以手指權當牙刷，手帕當做毛巾。第一的早晨，昨夜（應算今早了）問我話的那位老先生，看到我身無分文就招待我共同用餐，而後，昨夜同車而不相識的陳子元（註十三）自動送來十元，因為他知道我身邊連一個銅幣也沒有帶。同房（第六房）的黃華昌（註十四）君（想不到以後在同一案件，還住在同一房子裡許久。）給我五元。

最大的驚異是那「四·六」時由新生南路宿舍逃脫的簡文宣兄卻在這裡當外役。黃華昌君向我悄悄地說明簡兄被捕的經過。他被刑求數次，都沒有任何口供；另一位同時被捕的是台灣人的日據第一屆自願兵，（那裡是自願，大部分都是保正大人和警察大人合作的結果。就是如此也是一半無奈。一個保要選出幾個人，是指派的。反正不選他，就得輪到另一個人。）也是如此。簡文宣是「四·六」的通緝犯，那夜剛好這位日據時代的中士家裡被警察逮到。一抄家，抄出機槍、步槍、成箱的子彈

註十二 ◆ 語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吉侖特派主要領導人之一——羅蘭夫人（1754-1793），因與雅各賓派發生激烈衝突，一七九三年六月被捕，十一月處決。

註十三 ◆ 陳子元，嘉義人，台大農學院學生，因學委案被捕，處刑十年。

註十四 ◆ 新竹人，國校教員，處刑十年。

和手榴彈。私藏軍火最高刑也是死刑。後來才知道，他們兩位都屬於張志忠（註十五）下面的龜山地區的武裝工委。他們到死，沒有牽連到任何一個仁。以後龜山地區有人自新了，由這自新死了不少人。（註十六）反正事涉武裝，罪加一等以上，一命難逃。

簡文宣君，我在自聯會就認識了。我是自聯會理事，而簡文宣是自聯會下面的幹事。「四·六」時如被捕，他頂多是判了感訓了事，這一逃卻逼他上了梁山。他是唯一考上日本陸軍經理學校的台灣人，嘉義中學出身，性格敦厚，他也是在一場風雨下的「雨夜花」。

我內心一直等待夜間的訊問。刑訊的哀叫聲，雖然有一段距離，夜夜可以聽得到。十二、三年前，父親也在日本的高等課捱過，我自信可以承擔這一刑求。但當那位來逮捕我的仁兄叫我出去時，卻是請教「台灣の農民運動」一段譯文的用辭。一直到六月廿四日下午，我與陳子元、江源茂（註十七）兩君離開這裡時，都沒有被問過一句話。據說葉盛吉曾在這六室呆了幾天，也是如此。我們只是這裡的過客，要到另外一個地方。提訊云云，問幾句話，都是搪塞的話。

當時，傅斯年先生也是心很亂吧。他曾經是傅大炮，為留下五·四的一位大將〔陳獨秀〕——在《獨立評論》寫了文章。這時候，他能做到的只有為胡鑫麟先生和我，把家屬送的東西轉到「北所」。這在「北所」也是異例了。

上面提了一半。中共攻台，如果發生在我被捕之前，那還有一線生機。如今，如果真的發生，那生存的機會是絕無的。從藍衣社到軍統而保密局，他們絕不可能留下已經在手上的

活口。就算是冤枉的，他們也可以錯殺成千成萬。陳誠就可以說：「一路哭，不如一家哭」，難不成毛人鳳還比陳誠慈悲？而且，由此要去的地方，正是軍統變身的保密局。我在這三天多的時間已經看出了這一點了。

沒有牙刷、毛巾、草紙和錢，日子雖不好過，過了一天也慣了。日據時代，全校當娃娃兵，由淡水轉防新莊的桃園街道與成子寮——山腳——五股而到小小部落時六份相交的高約二百公尺左右的丘陵，沒有下雨就沒有水，三個月沒有刷牙也如此過來了。三天多的時間，我還是很少說話，黃華昌教我這裡的一些歌曲，現在也忘了。詞改得很好，曲子是借用「ソリスン波止場」。簡文宣本來只是點頭之交，這時候也偶而點頭而已。他的眼鏡掛耳的一邊壞了，用粗線克難一下。（當時軍中即風行克難一辭）

也是預期，一半是突如而來。六月廿四日下午，我異動的命令來了。來時沒有帶手銬，此時卻免不了。我和陳子元，還多了一位江源茂兄（法學院二年級）三人，坐了吉普車，到了延平北路的「北所」。（江源茂翌日即移送南所）

坐在車上，我又想到當年父親被送到特別高等課的情景。當「大正民主」將要落幕時，一九二五年，制定了出名的「治安維持法」。田中義一在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組閣後，三月十五日就逮捕了一千六百名的所謂社會主義者。四月強行制定最高刑為死刑，六月把只侷限於東京、大阪、愛知、神奈川、北海道及長崎的特高警察，擴及全國。翌年四月，在議會抗議這些行政命令未經議會通過的山本宣

註十五 ◆ 原名張梗，嘉義新港人，省工委會委員兼武工部長，領導海山、桃園、新竹等地區工作。於一九四九年新曆除夕在台北被捕，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犧牲。

註十六 ◆ 一九五一年元月間，國防部前保密局偵破所謂「台灣省工委會桃園龜山支部」；九月十八日槍決陳盛妙等五人。

註十七 ◆ 台南人，台大法學院學生，後來處刑十年。

治，被警察出身的黑田保久二所刺殺。以後又發生逮捕八百餘人的「四·一六事件」。時代的潮流就由此走向另一方向，必然帶著日本人走向一九四五的大破局。人在歷史的潮流中，微不足道，是的，尤其是在此時此地。

「北所」的手續如刑警大隊，我初被帶到B4室。向西是A6到A10，隔一通路是B5到B8。後面是B1到B4及A1到A5。B1、B2是女性。在B4，我見到一位熟人蘇友鵬兄（註十八），於是問他這四十多天來外面的情況。大概我話說多了，有位掃地的外役向看守報告，不到一小時，我就被轉到A2室。

A2室沒有熟人，而且這裡的作風也不同，沒有睡到馬桶邊的規矩。我進去以前，那位白臉的看守就對我說：「不要亂說話。」

這位看守是三位看守中最壞的。以後A1、A2改為集中案件移送軍法處的地方，我又轉到A10，與陳子元君同房。那個白臉的看守又當面指著罵說：「你們兩個是最壞的。」

看守還有一位黑臉及另一位胖子，軍階可能是中上尉。那位胖子很和氣，不過常出差，就由一位高胖的人來接班。其實胖子是保密局的幹員，台中山地工委——施部生案，他也出動的。別看他近四十歲又胖，動作既敏捷又能幹。不過，他值班時，特別對年輕的，也會說幾句笑話。黑臉的那一位則公事公辦，很少亂發脾氣。這位白臉的先生除了罵我和陳子元君以外，還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件是，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大妹經訓導處送來的東西——幾件衣服、日常用品以外，還有一罐奶粉（克寧的）、一瓶多種維他命。他要我寫收據。「牙刷」兩字中的「刷」，我一時想不出來。他就破口罵說：

「哼！這也算唸了四年大學。」

當時醫學院還用德文和日文教，中文當然

有時候生疏一些，而且我的毛筆字很差勁，又被奚落一番。

第二件是有一位L，很喜歡講話，被他聽到了。他要我們自己承認，不然不開放。L不認，場面就僵了。我索性冒名承認是我講的，由格子伸出左手，被他用木履狠狠地打了十下。我的手腫痛了好幾天，有人拿萬金油給我擦，但效用不大。這種狀況用冰敷效果很好，不過，那時候冰塊是無法弄到的。雖然我們可以用魚骨頭做針、用奶粉罐頭的鋼緣弄出修鬚刀、用飯粒揉成圍棋子，但冰塊是沒有法子無中生有的。

押房裡沒有事，大家就談吃。從基隆到高雄，還有宜蘭、羅東的人。尤其許省六兄（註十九），坐在馬桶上，還用手筆劃，大談小吃。我家鄉的小吃是全省聞名的：擔仔麵、鱈魚麵、碗粿、棺材板、包子、水餃、某處的魚丸湯一天只賣五百碗。但我很少吃點心，所以要吹牛也沒有資料。反而新竹城隍廟、台北圓環、祖師廟、台中大橋下的肉圓、高雄愛河邊的海產，我都嚐過。台南的小吃，都是真料，很少用味精（三十八年前，現在不同了）。

再下來就是行情的估計。我去的時候，吳石案已經判決，判決前一天還加了菜，卻無緣遇到這盛舉。不過，當時已經沒有人相信蔡孝乾的「感訓三個月」的說法了。我很少對此發表意見，只悄悄地在襯衫的內邊寫下自己的姓名和家裡的地址。

有一套象棋，我也常下。我們一天發三張草紙，是土色的那一種，只有不到現在衛生紙的一半大小。象棋要賭，贏一局草紙一張，或早上的花生一粒。好在這裡沒有出色的棋手，所以，我頂多是輸幾張草紙，幾粒花生。贏棋，我都不兌現，用掛脹的方式，一直掛下去。別看是象棋，有時候三分鐘就定勝敗，一

註十八 ◆ 臺大醫院耳鼻喉科醫師，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被捕，處刑十年。

註十九 ◆ 基隆人，廣告社店員，因基隆案被捕，處刑十年。

個小時的輸贏也是可觀的。有人甚至連早餐的七粒花生統統輸掉，只好白喝稀飯。

中午和晚上的乾飯，雖然菜不多，卻沒有限飯量，所以開飯的時間，「報告！添飯！」的聲音此起彼落，在這靜寂的空間添些生氣。睡的時候，容身剛好，不似「南所」和看守所那麼擁擠。北所的地點是從前的新高鐵公所就是日據時代的高砂鐵工所。

## 五、六月廿五日

我好賭，卻不賭錢。心內甚至連下一輛相遇的汽車號碼是單是雙，也要賭一賭。而這一次的豪賭，卻是生命的押注。廿五日上午十時半左右，我被叫到鐵工廠的樓上開庭。事實上是一位操廈門口音，自稱姓莊的的白晳瘦小者，帶著一個卷宗、一落十行紙、一套文房用具，輕鬆地坐在那裡，桌子前面就是一個空椅子。

「坐！抽煙嗎？」一包洋煙，我已經忘記是什麼牌子，不過當時我不抽煙。就在這時，窗口那邊，很別緻的洋房，電唱機流出貝多芬第五的那「三連音」。

「第五，命運。」我在內心這麼說了一聲，坐下來。

「謝謝，我不抽煙。」

父親的雙親都抽阿芙蓉（鴉片），父親因而自小被再三典賣。父親的短處不少，不過不賭、不抽煙、不喝酒，完全是由幼年的心理打擊而來的。以他犀利的腦筋，落到自認是「人生的敗部」，未完成正規的教育，心理上的補償作用吧，迫我要唸醫學院，而不知就此毀掉我也可算好學的一生。第五的那三連音的主題，一再反覆。那位莊先生抽出一份葉盛吉的口供和楊廷椅（註二十）的讓我看。我不用三分鐘就看完了，還給他。三分鐘可以細看三千

字，速讀可以看六千字。我已經知道他們說了不能不認的部分而已。第五的第一樂章，還沒有完。

那位莊先生，在眼鏡下凝視著我的眼眸，我並不避開。

「有什麼意見？」

「沒有。有一點小錯，我的宣誓是一月廿三日，而不是二月上旬。」

「喔，那是當然，當事人記得清楚。楊廷椅有沒有交下什麼工作？」

「楊廷椅我不認識。可能是自稱『老朱』的那一位吧？」

「對，就是那一位老朱。」

「沒有，我們只見了兩次面，聊了一些農村的問題。你也應該知道了，自二月份，所有黨員都收到停止工作的命令了。」

「那你該知道他們兩個人被捕了。」

「老朱是猜想的，葉盛吉是五月卅日就知道了。他們的工作站，全省都有。卅日傍晚，有一位要到瑞芳出差，他在台北住了一夜，我是間接聽人家說的。」

「劉漢湖和林恩魁，你認識嗎？」

「都是點頭之交而已。林恩魁早畢業了，可能去南部，劉漢湖自畢業考後就沒有見到人。」

「你有沒有要好的朋友？」

「宿舍的可以算是朋友，不過沒有深交的。這種年代，我不願再連累別人。等距離的交友，如套中國老話，也可以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知不覺，我也用廈門腔和他交談。

「好個君子之交淡如水。那為什麼不自首呢？」

問題已經到談話的重心了。我認為不妨單刀直入：

「葉盛吉已經被捕了。我一直等他北上，

註二十 ◆ 新竹人，日本民治學院畢業，學委之一，直接領導支部和台大醫、工、法三院支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九日犧牲。

再商量這一個問題。而葉盛吉被捕以後，我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那又為什麼不逃。」

「這個很簡單。我逃了，你們抓我父親，家裡就慘了。」

眼鏡下的眼神如刀，向我掃了一下。

「不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我淺笑，接受這個挑戰。

「您說笑了。」

那邊的手還在寫他的十行紙。

第五的第一樂章不知什麼時候就結束了，近十一點吧。北韓就是上午十一點向南韓宣戰的，對韓戰，我一直到軍法處才知道。命運的時刻，命運的地點。

「好了，你看一看，有沒有要改的地方。就寫下你的姓名，蓋手印。」

這手續也不用三分鐘，我只覺得自己的毛筆簽字太差勁。然後站起來，走下階梯。看守在那裡候著，又回到自己的房間。「白面」的值班。同房的人也沒有問我什麼。大家好意，早向我說，不該說的不要說，已經擺明的，除非很重要，就不必爭論。我回想一下，成績不算頂好，也不算很壞。起碼聽了一段貝多芬的第五。

我沒有看到如族譜那般長長的圖表〔判決書〕。傳說那圖表寫得比家譜還要詳細。起碼我沒有牽連到任何一個朋友。而且由他的作業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急著結束這一階段的工作。這一位廈門人，據說之後死於大腸癌。

一九二七年，我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動盪的世界走上更動盪的一年。在台灣、在中國、

在日本、甚至在全世界。

法西斯的名稱大約在這時候出現的，原產地是意大利，不過世界各地都通用。我聽過被特高打死的日本左翼作家（註二十一）的報導小說〈一九二八年三月廿五日〉，描寫了北海道網走的特高對工人的殘酷刑打。日本特高毫無忌憚地恐嚇他的對手時常說：

「你也想學小林多喜二嗎？」

父親是否聽過，我不知道。不過父親只唸過一期的小學，其餘都是中國的老式書塾。他不但對日本歷史不熟悉，就是中國近代史，也不熟悉。他只會向我說，小時候親身經驗的余清芳、江定，還有風聞的羅福星。余清芳和羅福星的例子，不過是飛蛾撲火。梁啟超就向林獻堂分析過台灣大勢的軌跡。有人批評梁啟超，思想常變。時代變，知識累積多，會變才應該的。他的大局觀，可能救了不少台灣青年。在當時，他不學老師康有為說：「我的思想三十歲就定下來。」可能也要有相當的勇氣。

法西斯到了德國，算登峰造極了。日本的陸軍及浪人學了一些，中國人也不差，甚至史大林也學了。德國是對付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異己份子及猶太人。史大林是專門對付朋友，杜哈捷夫斯基的案子（註二十二），朱可夫（註二十三）也株連。為什麼朱可夫後來那麼賣力，難不成是為了祖國？

奇怪的是，我以前的十二指腸潰瘍、出血和偏頭痛一直停了。要到火燒島以後，才再度和我作對。沒有藥物的地方，如果來了一樣，就很麻煩了。那時候，偏頭痛買得起的藥，只

註二十一 ◆ 小林多喜二（1903-1933），1931年參加日共，任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秘書長，負責文化界組織工作。1933年2月20日，因叛徒告密，在東京被捕入獄，當晚即被毒打致死。

註二十二 ◆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蘇聯報刊發表了一則消息，把杜哈捷夫斯基等一批最有聲望的軍事指揮官交付軍事委員會法庭審判，並在同一天判處槍決。不久前，杜哈捷夫斯基剛任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第一副人民委員。一般認為他是伏龍芝之後蘇聯最傑出的軍事活動家。

註二十三 ◆ 朱可夫（1896-1974），蘇聯元帥。一九一九年加入布爾什維克。

有APC，但是對胃不好。十二指腸不好，十二指腸出血就來了，我已經出血四次了，本來約好暑假開刀的，五月十四日以後時局亂了，再沒有心情考慮開刀了。

十二指腸潰瘍是許強先生（註二十四）下診斷的。兩樣事許強先生與我有關。當時還不大靠X光，而是用點壓法，「BOAS法」、「小野寺法」、「澤田法」都來。

另外一件事，就是當時三年級了，班上還有我與兩位老曾，還留光頭。許強先生叫我們三個：「還是留頭髮吧，以後到婦產科實習，有點怪怪的，人家也不好說出。」

因為這句話，結束了我們班上的最後三個光頭。留光頭不是立奇，只是為了一個省幾元理髮錢。

而這時候，許強先生卻在A4，有一天聽人家這麼說，放洗臉的時候，詳細一看，多了些鬍子，瘦了一點。第二次，我小聲地叫：「許強先生」，他怔了一下，還是走過去，走回來的時候又往我一看，似乎認出來了。

然而也不光只有上面兩件事。我很害羞，教授迴診，照例病人一律露上身。一遇到女病房，我總是抱著一大堆X光片站在走廊，所以許強先生才對我這平凡的學生有較深的印象——腸病、光頭、害羞的男孩子。

還有一件事，「寮祭」演戲，我還當了主角，許強先生不但看過，以後的「批評會」也來過。「寮」是宿舍的意思。為了歡送畢業的「寮生」，每年有這個節目，一直到去年〔一九四九年〕我們演了三天的話劇為止。以後可能沒有再來這麼一次的機會了。

並不是這傳統的好壞，當時日本高等學

校、大學預科，有這種風習。而那一次是連續三夜，每夜一小時的音樂，和二小時左右的話劇。醫學院有管絃樂團，除了省管絃樂團，可說獨一無二。那時候，師範學院音樂系還沒有那麼多方面的人才。不過，低音提琴還是借用農學院一位留任的日本人教授；他的女兒拉大提琴，是管絃樂團中的一點紅，當時似乎還在一女中唸書；只有他們父女是外人。

醫學院管絃樂團的歷史已久，省管絃樂團成立，許多樂器還是向醫學院借的，甚至有的「壯士一去不再返」了。醫學院的學生向來總是摸一種以上的樂器，這是當時的風氣。還得做一種以上的運動（當時還是軟式網球最多）軟式網球、橄欖球、曲棍球曾經冠於全省數年。

一個集團往往會有另一價值系統。在學生宿舍，有成百本書是屬於「必讀書」，自《聖經》到吉朋的《羅馬帝國興亡史》。所以，在那「雜談俱樂部」的常客與過客，都以此來交談，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客觀地來看，直似南晉的竹林派。這是話外的，順便一提當年醫學院的學生風氣。

由這幾點，許強先生認出我了。初時有點驚愕的表情，以後他也慣了，像他這樣的人既然都到這地方了，當然任何人都可能到這地方。其實，醫學院、醫專出身而被抓來的醫師還不少，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只是區區我一個人而已。國防醫學院的學生不少，相反國防醫學院出身的醫師卻不多。當時我們在這個地方，只知道吳石案、蔡孝乾案與洪國式案（註二十五）。于非（註二十六）下面的那些人（于非本人已逃了），我們還不知道。 >> 待續

註二十四 ◆ 台大醫學院副教授兼第三內科主任，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被捕，十一月廿八日犧牲。

註二十五 ◆ 所謂中共中央政治局潛台匪諜案，結果，劉全禮等九人被槍決，其餘刑期不等。

註二十六 ◆ 本名朱芳春，原在天津女師任教，一九四八年秋來台，任職《國語日報》編輯，並在省社會處主辦的「實用心理學講習班」授課。

### 文化廣場

#### 十、感動復又後悔的小故事

**說**到感動得哭了，我還遇過一次，那次哭的是男生。晚間在Carl住處，John Ross來到。John Ross是一位約莫六十多歲的美國白人學者，對查巴達有深入研究並已出版專論。此次活動原本強調「非白人」，但由於John Ross並非食古不化、教條僵硬的「白人左派」（在美國我確實遇到一些令人搖頭的「白人左派」，他們仍停留在對毛澤東、文革等東方情調的美好想像中，發行刊物、開書店、定期舉辦座談會），Estacion Libre因此破例邀請John Ross來。

工作室的火爐燒得通紅，墨西哥啤酒人手一罐。難得的英文聚會，講者是美國人，無須翻譯，直接對話，伙伴們情緒顯得high。說美國，論古巴，談查巴達及全球化。John Ross聊到年輕時來墨西哥小鎮居住，由於他是共產主義者，鎮裡沒人要接近他，加以醫療系統欠缺，他剛出生的小孩在一個夜裡生病了，他焦急地抱起小孩，跑過小鎮荒涼的夜間小徑，找不到協助。孩子死了，剛出生不久就死在父親為他選擇的惡劣環境中，父親其實有別的路可選啊，反抗或妥協。John Ross瘦骨嶙峋的坐在工作室中央，面向火爐，臉色蒼白微醺的說，孩子死後，他更堅定要走這條難走的路。

雖然投身左翼運動讓他和家庭關係淡薄——John Ross另外兩個小孩，一個當歌手，一個當商人，都沒繼承他的思想，都和他疏遠，John Ross說他從不後悔。

這樣一路走來的左翼老輩，觸動著年輕小伙子們多少投射自身處境的哀傷預感，Carl、

Fernabdo都掉下男兒之淚，Znon也眼眶潮紅。短暫感性後，John Ross開始滔滔不絕。我以為氣氛熱烈，但言語神色應該透露裂痕，只是我未曾察覺。隔天醒來，Rosa說他不喜歡也不高興John Ross自以為是的學者姿態，「都他自己一個人在講，完全不聽別人說。」而感動過的男生們也說John Ross仍不脫白人學者的架勢等輕微壞話。幾天後，新年將至，John Ross原本與我們相約一起去參加慶典。由於EZLN領袖會到場的主要慶典地，年年在自治區中臨時挑選一村，並不一定，靠內部消息流傳，因此John Ross竟放我們鴿子，自行去盛大舉行的Oventic，任由我們去La Realidad，（害我沒看到Marcos），也引發一群人對他的不滿。

唉，翻覆的感動，遺留在喝酒的那夜，印證感動易發，理念後盾才真正決定運動者長期的方向。淚，像雨會蒸發，像霧讓人迷濛，但大地在雨霧的滋潤後如何一本堅實？

#### 十一、Zapata：世界延續著老路？

在San Cristobal時我喜歡去逛傳統市場，市場親切熱鬧，色彩繽紛的蔬果青菜，色誘著人們吃食的慾望。「墨西哥人」、「印地安原住民」及外國觀光客交易行走其間。

我知道，當我以「墨西哥人」及「印地安原住民」來區分印歐混血者與Ch'oles、Tzotziles、Tzeltales等族裔的印地安人時，實在不太恰當，因為他們通通都是墨西哥的「國民」，而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墨西哥人」或多或少摻雜著印地安人的血統。但就像世界各

地原住民所遭遇的歷史困境，當「國家」被建立後，原住民通常淪為二等公民，「純種」的印地安人也彷彿被長期棄於政府提及的國家形象之外，是不屬於「墨西哥人」的——這不止關乎容貌衣著的差異，更是原住民經年累月被邊緣化後，土地被剝奪、文化被摧毀、經濟被壓榨、連走在路上都備受歧視所造成的內在差異。

因此，就像問美國印地安人，是否覺得自己是美國人？或者台灣原住民是否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一樣，瑪雅文明的後裔——如今已隸屬於墨西哥這個國家的印地安原住民——從十六世紀始，也不斷被強迫面對「國家」認同的問題。回溯起來，「國家」何嘗造福過印地安人啊？

西班牙殖民政權來到墨西哥，首先帶來天花等外來傳染病，造成印地安人大量死亡，而後屠殺、驅逐佔地、強制勞動、種族隔離政策等，將生活在同一塊土地的人種劃分為三個階層，最上層是西班牙裔的殖民者，再來是西班牙人、印地安人及非洲奴隸的混血，最底層則是純種的印地安人及黑人。如此結構，在一八一〇年墨西哥趁拿破崙在歐征戰而宣布獨立時，並沒有什麼改變。經濟上，財富仍掌握在少數外國投資者手中，文化上雖混同著歐洲（淺色皮膚）與印地安（深色皮膚），卻是極力抹去在地文化。

一八二一年，西班牙終於同意讓墨西哥獨立成「國」，但獨立之初，政權極不穩定，總統更迭率極高。殖民主義種下的惡因，持續長出紛擾的枝葉，盤根錯節，荊棘般深根成林。禍端的根源，常是少數當權者握有絕大部分的財富及權力。一九一〇年，按耐不住的怒火燒向當時的獨裁者狄亞茲（Porfirio Diaz 1878—1911），這位總統儘管擁有一半印地安血統，卻常在臉上撲白粉，讓自己看來比較像歐裔人士。此後，內戰激烈近十年，各派游擊隊

闖蕩。由印地安人薩帕塔（Emiliano Zapata）率領的農民游擊隊是其中一支，重點在於要求土地改革。

知名的墨西哥女畫家卡蘿（Frida Kahlo）曾在日記中回憶到：

「我親眼目睹薩帕塔對抗政府的農民戰爭。母親打開臨阿藍德街的窗，讓薩帕塔的部隊進入。飢餓的人與傷者從窗口跳入我們家，來到客廳，母親為他們療傷、供應厚玉米麵包，那是當時科約肯唯一能弄到的食物。一九一四年，戰事方殷，子彈呼嘯穿梭，直到現在我仍然能聽到它們的聲音……。」

——引自《女畫家卡蘿傳奇》一書，Malka Drugker著，黃秀慧譯

少女卡蘿並將出生年份由一九〇七改為一九一〇，以示她對革命的同情。而後，一九一九年薩帕塔遇害身亡。而後，一九三四年革命建制黨（the Institutionalized Revolution, PRI）長期統治墨西哥，貪污、舞弊、歷經二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延續著舉外債的模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 簡稱WB）對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援助（箝制）」，從一九六五年起，開放美墨交界地帶，以免稅、保稅、不徵收增值稅等優惠，號召外資來此設立加工出口區。

（來吧，來投資！來用我們廉價的勞工，來污染我們沒有環保防線的土地！）

紡織業、汽車業、電子業，大量移往美墨邊界。投資者的邏輯很簡單，哪兒有利益，就往哪裡去。美國工資貴，就往墨西哥去吧，那裡勞力密集且便宜；美國有環保標準，就往墨西哥去吧，那裡不用再花錢設置污水處理廠等措施，廢水可以隨意傾倒在河中。而墨西哥政府維持一貫基調：為了「發展」（為了從中分享利益），打壓工會、犧牲環保。繼續負債、繼續舉債，以依附者的角色進入全球金融體



系。

然後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美國為首的跨國資本，希望墨西哥將市場全面打開，美、墨、加三國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NAFTA）。在那象徵性濃厚的日子，NAFTA正式在墨西哥生效的首日，EZLN持槍站出來反對。

反對NAFTA，反對以自由貿易之名，讓越來越少人掌握越來越龐大的財富，讓越來越多勞動者螺絲丁般卡入一台沒有平等基礎的機器，生產、生產，物質急速積累，相對的窮人卻更加無力的倍增。

當墨西哥政府以加入NAFTA為榮，宣稱墨西哥已從第三世界國家晉升為第一世界國家，查巴達無疑打了這繁榮表象一巴掌，看呀，看清楚，在號稱進步的面具後，印地安原住民仍死於飢餓。

自NAFTA生效以來，墨西哥政府持續負債達上千億美元。欠錢的人（國家）不得不聽從借錢者的話。國際貨幣基金扮演窮國債權人的狠角色。墨西哥政府被迫出賣國家產業，機場、鐵道、通訊線路等，國家石油公司Pemex雖仍屬國營，但百分之七十幾的石油產品都得輸到美國以償還債務利息。

局勢演變，位於墨西哥東南方的契帕斯省，印地安原住民的老家，石油管線源源不絕地朝資本家輸出，印地安原住民卻連一點利益也分不到。

從一九一〇年薩帕塔為爭取土地而發動農民革命，到一九九四年EZLN延續「古老」訴求持舊式機槍起義，近百年過去，印地安原住民仍然飢餓得連記憶中畫家卡蘿家溫暖遞出的厚玉米麵包都吃不到——這就是進步？

這就是所謂的進步？

進入NAFTA後，墨西哥貧富差距仍持續拉大，到了二〇〇〇年革命建制黨歷經七十一

年的統治，終於下台，政黨輪替，由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裡曾任職可口可樂公司高級主管的福克斯當選新任總統，仍是白人、仍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仍然依附在跨國商人的腳邊搖尾巴。而早逝的印地安英雄薩帕塔的圖像，也仍然被畫在貧窮的印地安村落，標舉出反抗之心不死。延續著薩帕塔，延續著日漸加劇的老問題——薩帕塔濃眉、蓄著八字鬚、黝黑的方形臉，目光炯炯地望向現在……。

## 十二、檢查哨與毒品

再次我在清晨三四點起床，半眯著眼坐在床沿整理行李。這些天都睡得晚起得早，但精神挺好，小賴幾秒後，房間裡五六個人窸窣窸窣的起床聲便互道著早安。出了屋子，街道爽朗中飄著雨霧，僱請來的小巴士再次載我們從尚未甦醒的San Cristobal往叢林區前進——就要過年，我們要去村落過年！

此行我們包車，直達目的地，越往深山走，道路越小條。窗外飄著雨，車窗映著山壁潮濕的綠意，流淌水滴。泥濘讓車行速度十分緩慢，駕駛還一度下車察看輪深陷泥地的情形。我凝視窗外，想起墨西哥女畫家卡蘿描繪的「巴士」一圖，畫中提菜籃的家庭主婦、穿吊帶褲的工人、以披肩懷抱住嬰兒餵乳的印地安婦人、面窗的小孩、拿錢袋的資本家、繫著飄逸絲巾的年輕女人，比鄰坐在巴士座位，恰如墨西哥社會的原型。卡蘿將印地安婦人畫在視線中央，但實際情形原住民通常位於邊陲。

啊，突然，雨刷間遙迢泥路出現一位戴共軍帽的黝黑男子牽著一匹馬。EZLN革命那天，Marcos透過網路傳遞出的照片即是率眾騎馬的英姿。（薩帕塔也騎馬吧？只是當年騎馬是必然，今日則象徵意味濃厚。）小巴士繼續前行。啊，爸爸、媽媽、兩個小孩在我們車子經過時，站在路邊對我們揮揮手，雨中鮮豔

的原住民服飾及手中拿來遮雨的芋頭葉，在灰濛濛的風景中格外醒目。

沿途我們還經過檢查哨，一種是移民局之類的，察看是否有偷渡客或簽證不符，一種是軍隊，站在道路圍起的鐵蒺藜前，持槍穿軍裝。兩種檢查哨，各自都盤查了多次。Carl在這方面算是老經驗，他淡淡地說，之前盤查更為嚴格，因為許多外國人知道EZLN後，都想深入革命地，和革命軍接觸，但墨西哥政府不願來訪者將真實情況傳播出去，從一九九四年起，陸續「送」出上百名國際人士，理由是「干涉國家內政」或「沒有申請採訪簽證」（若事先申請，也一定不會批准）。且縱使墨西哥政府想偷懶，不認真盤查，美國老大哥也會施壓。我在San Cristobal便讀過美國商人「要求」墨西哥政府積極掃蕩契帕斯省，以利投資的消息。福克斯上台後，宣稱要撤軍，但我們都親身經驗到軍隊仍在契帕斯省沿路設立檢查哨攔檢。新聞報導的說詞則是，新政府擔心鄰國會藉由邊境偷渡毒品槍枝進來。

「墨西哥政府仍試圖將EZLN抹黑成毒販，」Emmanuel說，「但查巴達絕對沒有運送毒品以獲利。」

我點頭，聽伙伴們討論起中南美洲確實有些游擊隊以走私毒品作為經濟後盾，但相對的美國也以此作為軍事及經濟介入的「正當」理由。例如二〇〇〇年，美國政府投入十幾億美金，展開「對抗毒品之戰」（War on Drugs），其實大部分款項都給了跨國公司，用來進行軍事訓練、購買直昇機、武器等。說白些，就是以「滅毒」之名，消滅那些妨礙美國公司順利壓榨的反對勢力。但查巴達不碰毒品的立場鮮明，難以羅織入罪——毒品是罪？如何界定什麼是「毒品」？香煙及酒為什麼不是「毒品」？毒品的種種，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學，伙伴們沒聊太多，倒是彼此心知肚明，此次學習之旅中誰愛用「毒」、誰沒興

趣、誰又堅決不碰，還在身體刺青NO DRUG的字樣。對於吸毒的態度，在我觀察起來，應是此行團隊較大的理念分歧，沒有共識。

經過好幾個小時說說睡睡，小巴士來到村莊入口，中午將近，三個穿格子襯衫的印地安青年要求察看我們的護照及推薦函。Carl將證件遞出，其中兩個青年回村莊通風報信，過了一會兒，走出來，邀請我們進去。

La Realidad，我們來到名為「真實」的村落，將在這裡住上幾天！

### 十三、住在真實村

食：

墨綠山脈環繞的La Realidad（真實村），和之前去過的Acteal最大不同是這裡「綠草如茵」，Acteal是一九九七年村落被毀後異地重建，遍地黃泥，但La Realidad樹木扶疏，零落的木造屋間，孩子們赤腳踩踏的盡是柔軟微刺的草地。不過我用「綠草如茵」顯然不恰當，太中產階級，容易讓人聯想起城市制式的草坪。並不是。城市缺乏綠地才需要植栽，山區自然生成繁茂的不需要豎起「請勿踐踏」告示牌的雜草青綠，清晨濕潤著水氣，冰涼涼的露珠隱蔽著一地細碎晶瑩，傍晚草地更像在呼喚著人們去坐坐。

La Realidad有條河流過，我們就住在河邊。一間木造屋，由劣質的薄木板搭建，石綿瓦斜角屋頂，木頭橫樑張貼民俗風味的剪紙，水泥地擺放七八張長板凳，牆角並安放一座聖母像。我猜想這裡平常是宗教聚會所。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後，印地安人臣服於天主教，但在宗教物件及儀式上多少融進民族傳統，例如在十字架裝飾些羽毛之類，色彩比較貼近印地安人喜好的鮮豔。

卸下背包，窗外立即探進兩三個原住民小孩好奇的手，指著我們從背包裡拿出的土司、

果醬、花生醬竊竊私語：（這是什麼？）（那是什麼？）

土司是我們在La Realidad的第一餐，之後，伙食委由村裡一個婦女組織為我們備餐。

「餐廳」是未上漆的木造屋，比我們住的那間小很多，木板隔出烹煮及用餐的空間。燒柴的爐灶一邊放著鋁鍋，火苗竄動像煮湯般煮著一大桶咖啡，一邊鐵板平滑炙熱，印地安婦人熟練地將玉米揉成的麵團，薄薄地往鐵板一甩一拿，一張張玉米餅（tortilla）就這樣迅速烙成。熱煙滾滾從木縫竄出，而陽光，陽光也從同樣的縫隙透進一道道光的薄幕。泥地放著將洗的碗盤，備著將燃的薪材。印地安婦人在爐灶前忙碌，身手俐落，煙霧陽光常讓狹窄的木造屋充盈著騰雲駕霧之感。將黑咖啡倒入塑膠杯、烙好玉米餅、再將蕃茄煎蛋及黑豆泥裝乘進淺盤。每天每餐，黑咖啡、玉米餅、蕃茄煎蛋、黑豆泥。

許是我在村落居住的日子不夠久，不夠久到貪戀起島嶼繁複小吃。每天每餐我坐在長板凳嗅聞著廚房從木縫間散出的氣息，熱煙裊裊將我環抱，等待印地安婦人將食物端上桌。我一下子就會吃得精光。

貧困的美味，令人懷念；但對於印地安小孩，我們吃膩的土司也許反倒深具魅力。

從住進村落起，年幼的印地安小孩常到我們屋前玩耍，有些大膽的，甚至伸手跟我們要食物。（這是什麼？那是什麼？）沒見過的總是新奇。但我們被交代不能給孩子們任何東西，若有人前來兜售繡有EZLN字樣的手工製品，也不可購買，因為村落採共享制度，不想放任「自由」買賣的模式，也拒絕觀光客施捨的態度。La Realidas有類似「合作社」的組織，村落婦人將手工藝品等集體交予合作社販賣，每條手巾繡有縫製者的姓名及標價，販售後團體會將利益所得依銷售情形加以分配。但還是有人想多賺些。要不是Carl事先言明，我



真的很難面對孩子們從窗口探進來，仰起詢問之眼，也難以拒絕年長些的印地安女孩，從袋子裡拿出一條條手巾，問我，要買嗎？

外來的糖果永遠不夠，給了其中一個孩子糖，沒分到的那個怎麼辦？就像再多觀光客帶來外匯，貧窮地裡的相互競爭，若沒有朝向一套更合理的制度全面改進，仍將只是少數人循老路獲暴利。

所幸，La Realidas尚保有自主性。小孩沒有San Cristobal裡討生活的卑微狡猾，流著鼻涕、打著赤腳，憨厚些也自若些。環境決定面貌，不無幾分宿命。就像我在叢林區從未見過一個胖子；食物匱乏著，沒有減肥之類的困擾。黑咖啡、玉米餅、蕃茄煎蛋及黑豆泥，天天如此。

直到離開前，印地安婦人特別為我們宰了隻雞。非常瘦弱的一隻雞。我在島嶼從沒見過那樣營養不良的成雞——自力救濟著，只能在貧窮村落翻泥找蟲吃的雞。知道要宰雞，Tim自告奮勇當「殺手」，印地安婦人教他一手抓住翅膀，一手往脖子扭——可憐的雞，異於村落裡其他雞的命運，竟落入一個沒經驗的人手中，一扭，沒死，瘦雞掙扎著，二扭，奄奄一息，還是沒死……。瘦狗懶懶走過，印地安婦

人仍努力以手勢教導她的學生，而小女孩含著拇指楞楞看著戶外草地上演一齣文明人殺雞的戲碼——城市生活讓我們失去太多技能，面對電腦Tim是一流的，但對於一隻雞可就沒輒了。

折騰了好一會兒，瘦雞終於放入熱水浸燙拔毛，緊接著鍋爐裡燉。佐料只有鹽。黃褐色飄著油的雞湯以及小得可憐的雞塊是我們在此最豐盛的一餐。木桌點上蠟燭，夜幕蟲鳴微弱。墨西哥市來的歌手拿吉他，大夥兒就著燭光唱起歌來。一首接一首，吟遊詩人Bob Dylan及黑人雷鬼音樂之父Bob Marley的歌，尤其唱到自由之歌（Song of Freedom），情感放聲旋律線，迴盪著燭光搖曳的木造屋。黑夜叢林在外籠罩，木造屋裡幾個印地安青年陌生於這些歌，陌生於搞社會運動的外來者高昂的興致，只在大家最後興奮地舉起手，以西班牙語高喊：「Zapata Vivi」（薩帕塔永存）、「La Lvcha Sigve」（持續奮戰）等口號時，靦腆地站在屋角笑了起來。

#### 衣：

印地安人種族繁多，衣飾也不盡相同。La Realidas婦人自製衣裳，男子大多穿著買來的格子襯衫及黑長褲。女人尚未結婚前，化學亮面布料裁剪成兩件式裙裝，粉紅、橘黃搭配豔綠、深藍，綴以花邊；結婚後，拿掉髮飾、項鍊、耳環、手環等，改穿一件式洋裝素樸。Acteal的女人則是布織條紋上衣搭配黑長裙，上衣方形領口處繡以紅毛線，戴上珠珠項鍊、繫上腰帶，我覺得比La Realidas漂亮，但男人同樣已全面向成衣投降。

倒是政治觀光客的穿著十分一致，不管是來自歐洲美洲亞洲，黑人黃人白人，男女皆是外套長褲。現代社會的演進讓服飾失去民族特色及標誌能力。時尚舞台往偏遠部落尋找色彩、花紋、樣式，收編進服飾工業運作的環節裡，品牌潛越了族群，階級劃分了界線，性別

也起著影響力。

在貧窮村落，我觀察到一件令我疑惑的事，那就是印地安婦人難道比較不怕冷？為何當我們長褲外套，她們仍是短袖洋裝？（不管在La Realidas或Acteal）我懷疑她們並不是特別不怕冷，而是衣服僅那麼幾件。在男女位階不平等下，只好鍛鍊體魄，忍受小腿手臂在寒冷中坦露，只好同一個冬天，姊姊穿短袖，弟弟穿毛衣。

#### 住：

住在木造屋，我怡然自得，但木造屋裡只有水泥地及長板凳，晚上睡覺怎麼辦？

Carl事先有交代，請自行攜帶吊床。吊床在村落普遍，像我們住處穿廊便掛著一個，印地安小孩沒事便坐在那兒晃呀晃地，對面，跨過草地，另一間木造屋，三兩個白人觀光客也常斜躺在吊床悠閒地看書。但我不敢。眼看伙伴們拉開吊床，將細細的帶子往屋樑懸綁，想到晚上搞不好會掉下來，頭碰水泥地，只好將長板凳併在一起鋪上睡袋。嗯，還是木頭穩當些。

夜晚村落沒電，點蠟燭，伙伴們在水泥地擺開西洋棋盤，席地鬥智。偶爾墨西哥市來的歌手及他寫詩的太太，還有戴帽子、打扮中性的女攝影家會來聊天。至於白天？醒來先去隱蔽在樹叢間的木造廁所「解決」，蹲在木板空下的凹洞旁，頭往下瞧，可見架高的廁所底，糞便尿液及衛生紙半掩在泥地坑洞裡。只容一人蹲立的廁所，橫著一塊木板當門，門栓是鐵絲，虛掩罷了。印地安人用石灰灑在廁所地板，防蚊也防臭。

（後來我離開村落，才發現自己被文明馴化的身體果然不耐蚊蟲，小腿斑斑點點刺癢著遍佈的「紅豆冰」，據說是村落跳蚤啃咬。紅斑約莫半年才漸次消退。不過當時住在村落，我渾然不覺夢中有蟲，畢竟沒見過任何一個印地安人身體有異狀。）

上完廁所去河邊洗手，河水清澈是村落命

脈，印地安人用木板橫過河道當橋。婦人赤腳來汲水，舉起雙臂，將裝水的塑膠桶或陶桶，頂在頭頂，腳步輕盈的走回住所。偶爾我們也去河裡洗衣服，水淺處的石塊邊，搓搓揉揉，常聚集著印地安婦人彎腰在洗全家的衣服，但在學習之旅中男人要自己洗衣——如果文明有進步，這算是其中一項吧。

其餘時間，遊逛村落。

La Realidas很大，從住處跨過橋去，順著綠草地，低矮的木造屋一間間繪著風格相異的壁畫。寫實的油畫，鉅細靡遺描繪查巴達民族解放軍從滑雪面罩裡透出眼，卡漫造型的EZLN成員留著長髮，當然紅星及握拳是必備的圖騰，契\_格瓦拉及薩帕塔也有多種版本的肖像。木造屋因壁畫而特色。這些壁畫大多是革命後，來此幫忙的政治觀光客所繪，其中也有Carl的筆跡。

我拿著相機（已得到EZLN拍照允許），逛到籃球場，看見兩個小男生在打球，心想為他們拍張照吧，相機一拿起，小男生馬上對我搖手呼喊——（不可以）、（不可以）、（握有相機，並不表示你握有攫取畫面的權力），由於語言不通，我猜想小男生並非要用金錢換取他們的同意，而是受過教育，知道有能力對外來者說不。這樣很好，我點點頭，關上鏡頭。別讓觀光客予取予求，別讓錢予取予求，別讓外來力量破壞儉樸生活之美好；例如洗澡。

住在La Realidas，怎麼洗澡？

剛聽到答案時我和團隊裡唯一的女生Rosa面面相覷，冬天耶，尤其叢林可不暖和，但村落不時興熱水，要洗澡必須像飲水洗衣般往同一條河裡去，往山的更深處去。猶豫了好一會兒，我與Rosa下定決心去洗澡。走過綠草地、泥土路，通過籃球場、繪著壁畫的平房，往裡再往裡走，水聲潺潺的河道更為寬廣，樹叢低垂處，岩石圍聚成天然的水域。是這裡嗎？轉

頭望向河道另一邊傳來人聲，一群印地安男人正在洗澡。岩石邊陽光灑落，男人們似乎全然沒注意到我們來到，仍站在水中俐落的動作著。躊躇著兩地距離不怎麼近，但也不遠，不夠遠到看不見彼此，我和Rosa對看後終因已無前路，脫下鞋，赤腳走入河。

河道周圍景觀優美，樹叢間依稀可見村落拓墾出的草地。脫下衣服，緩緩將身體浸入水流，聽著鳥叫蟲鳴及不遠處男人撥動水花的聲響，及膝的水深，清澈見底，抹肥皂，看風景，漸漸的就不那麼冷了，甚至有種欣慰，不安與疑慮隨衣服褪去。在印地安村落男人有鞋穿，女人赤腳；男人長褲外套，女人冬天仍然短袖洋裝——位階不平等，可見一斑。但關於洗澡，村落的人自然而然遵守著界線，沒有標明的界線，一邊是女人的洗澡地，一邊是男人的。沒有搭訕、挑釁或任何形式的輕佻。我有種奇異的感動。住在城市只要稍微露肩露背，就要被說成引誘犯罪，遭致異樣眼光，在兩性定位保守的印地安村落卻是讓女人保有自由洗澡的權力，沒有眼光殺傷，更遑論肢體侵犯。

突然想起有天吃飯時，與一群印地安女孩聊天。愛情與婚姻。女孩害羞的問我們有沒有男女朋友，Ernesto告訴她們，他喜歡的是男生。啊，女孩們掩面驚呼，不敢相信地直說怎麼可能？Ernesto明明就是個帥哥呀，怎麼會喜歡男生？

印地安村落也有同性戀嗎？我沒有答案。虧得Ernesto略帶玩笑卻又無比認真的對印地安女孩解說自己的性愛取向。他的說法，想必為村落女孩帶來衝擊，（如果她們認知到Ernesto說的，可是掙扎多年後決心坦露的實話。）文明透過任何縫隙與管道展現它繁複絢爛的多面，包括對異性戀家庭制度的質疑與顛覆。但我仍顧忌著在村落裡不可穿著太隨便，不過山區溪流裡洗澡時，意外體驗到的自由，微妙而令人喜悅。回到木造屋，雨又落下，我

坐在門廊前望著村落迷濛濕濡的風景，點根煙，想起島嶼，想起離鄉前糾結於心的情人及生命中那些困頓、依戀與不捨，埋首在長板凳寫信：

親愛的：

一年又將過，歲次刻度的漸次模糊，到底是身體操控的感受力必然衰退，抑或對人世體驗的不再新鮮？墨西哥山脈裡的原住民聚落正在下雨，下雨什麼都無法做，觀光客的我們在木造屋內下西洋棋、唱歌、發楞，而窗外探頭探腦的原住民小孩觀看著，兩個小男孩拿出玻璃珠，彩色的玻璃珠承載著一個雨季的童年在灰色的水泥地上滾動落寞。此刻，印地安男人及女人在家做什麼呢？看電視成習慣、看書成習慣、接受資訊成習慣的我們，在雨季被「困」於山村，因為寂寥之感悠悠，散落在豐厚的自然裡而參雜著不統一的情緒，但印地安人的生命就在此，度過多少窮極無聊的雨季啊。

行：

乘車到La Realidas途中，看到印地安原住民在走路。黝黑矮壯的男人從領口處直接套了件黑色皮毛的斗蓬，走在前面，後面跟著印地安婦人，黑髮綁成髮辮，圍著大披肩，提著手編提籃，身邊通常還跟著小孩；也有印地安婦人從肩膀往腋下用布縛捆成一個大包袱，背上還背著頭顱晃呀晃的嬰兒。他們行過山稜線，徒步，徒步中摩托車經過、汽車經過、飛機都飛過囉，印地安人從貧窮的山區村落走出來，經過一處處供乘客搭乘的貨車集散地，有的上車有的並沒有。沒錢只能靠雙腳行動，以步行的速度，行過雨天，泥濘裹住腳踝，一步一步；行過日頭凶豔，土壤乾涸堅硬，城鎮的柏油路缺乏含蓄性格，腳底板踏過，常被發威的太陽熱燙燒烤、常被尖銳的小石子琢磨復琢磨。春夏秋冬更迭，季節拉換過山，依然矗立的布景。

（若是妳，預知未來交通必然壅塞如城市

內分泌失調的命運，行走著泥路，擁抱發展的意願是否仍然熱切？）

汽車比摩托車快，摩托車比腳踏車省力，腳踏車當然又比步行快些，但是步行在城市塞車時往往比車快。為了儘速達到目的地，人類發明又發明，物質基礎擴張，有了摩托車，回不去腳踏車，（廢氣污染也罷，工廠牟暴利也罷）有了汽車回不去摩托車，（更大規模的工廠出現，更大規模的利益，匯聚到金字塔頂端，由少數人操控把持），文明看似緩慢其實以快得驚人的速度，朝向更精密複雜的方向推展。

當我習慣開車，馴化的身體坐在駕駛座等待紅綠燈指示，想起因貧窮而不得不步行、不得不受限的人們。同一條路，印地安小孩站在爸爸媽媽身旁，當我們租的巴士駛過，他退閃到路旁，圓亮的眼在雨勢磅礴中濕著身子、濕著衣裳、濕著手中那根幾乎快要被折彎的竿頭葉，透出不平與慾望。如果能夠選擇，他當然也想坐車。少來那套步行的美感之說。但發展，難道必得循著追趕的老路？開發之路，讓土地變成錢、水變成錢、時間也變成金錢，競速、競速，金錢流動的速度越來越快、越來越龐大、也越來越不平均。有錢的白人可以坐飛機到各地觀光做生意，貧窮的印地安人沒得選擇，必須一輩子在出生地步行。飛機與步行。當我們千里迢迢來到的車子駛過山區的泥濘道路，我從車窗看到印地安小孩的眼，他正看著我。我們彼此擦身而過的一眼，撞擊出某些悸動。我突然想到，不知道這個印地安小孩長大後，會朝著金錢追趕，還是逆向成為游擊隊員？

育：

而革命是場教育，撕裂開制式課本裡令人難耐的消磨。課本常是謊言最大規模的集體出處，光鮮的教室，課桌椅，黑板，板擦與粉筆。當老師背過身寫下「花」——花對於成長過程中普遍經歷兩三個兄弟姊妹會餓死的印地

安小孩，與從小習慣麥當勞叔叔親切笑臉的白人小孩，必有什麼不同吧，像是同一顆種子落在礫石沙地或施肥過度的壤土底，將長出的差異；像是日照天天偏斜，長久導致的陰影？在花之於美麗，美麗之於白晰肌膚的邏輯演繹中，黑板串連著，老師將寫下什麼樣的「標準答案」？

再來，我們教導難一點的字眼，「英雄」，（在台灣「吳鳳」這號虛擬人物曾在課本上久駐說是為了糾正原住民出草的習性而被殺成為英雄；蔣中正是民族英雄的頌歌我們也都在小學操場大聲唱過。）我們墨西哥的英雄是誰呀？老師從當權者的角度發問。想像一個印地安小女孩坐在齊仰著臉望向老師的同學間，默默疑惑地想起薩帕塔，薩帕塔不會出現在黑板的答案上。再來，「游擊隊員」、「邪惡」、「正義」的意義。進階的封閉體系。（開窗呀開窗！）誰在教室外吶喊？誰在教室內焦急？誰在教室延伸不及的窮鄉僻壤爬不上晉升的階梯？當墨西哥政府透過教育指控游擊隊動亂（革命），革命（動亂）也透過EZLN的訓練及各自治區的教育，推展著觀念。

村落小圖書室裡，鐵架靠牆而立，書籍凌亂，封扉破爛。印地安小女孩及小男孩拉開教室的課桌椅，圍聚著，跳起傳統舞，沒有固定鐘響區隔上下課，我看見他們離開教室時踩踏著活力的步伐，清亮喊著「Zapata Vivi」（查巴達永存）。革命是場教育，衍生一堂一堂的課程，母語、西班牙語、唱歌、跳舞、騎馬……、持槍護衛自我的本領。既然隸屬於政府的教室，開不到印地安人的門前，既然教室分發的課本散播著成套繆誤，乾脆在叢林裡開課。查巴達在各支援村落辦教育，除了針對孩童，訓練EZLN成員是一大重點。我在San Cristobal街道販賣的查巴達商品中看過那樣的照片——深山叢林裡，EZLN的印地安女人也像男人一樣穿著深色上衣黑長褲，持槍在山谷

稜線間不怎麼整齊劃一的動作，（我不確知EZLN目前是否仍有在操練），其中一位女孩叫Maria，接受訪問時她二十二歲，對記者說：

「我住的房子，是由蘆葦和泥土建成。從前，我只知道編籃子，但是自從加入EZLN後，我學習到西班牙語，也在EZLN認識我的先生。我們奮戰，是為了土地及更公正的收穫。」

還有一位Captain Martin，Tzeltal族，他說：「我今年十八歲，加入EZLN已經三年，我在這裡學習西班牙語及如何使用武器。EZLN軍隊裡有許多女人，這對我而言沒什麼不一樣。我們在這裡是平等的。我有三個兄弟三個姊妹，他們也全都是EZLN。」

EZLN並有些外圍組織；我在San Cristobal時，Carl曾邀請兩位從事Network（通訊網）的年輕男孩來與我們對談，男孩說，從前在學校很不快樂，但現在，「組織裡有很多工作，工作就是學習，我們從中學到很多，也比較快樂。」——也許未來查巴達新一代的領導者就將從這些年輕的游擊隊員中誕生。

誰說得準，想法藉由教育像種子經由風、經由水、經由某個不知名的旅客不經意的行腳將帶往哪裡發芽？

我們去拜訪一位掌管教育的游擊隊員，他蒙著臉，壯碩的身軀坐在低矮的教室課桌椅前對我們說，「教室要和世界連結，不管你說什麼語言、什麼膚色，要為人類做點事。語言的傳承很重要，因為語言的傳承，同時也傳承了傳統文化及歷史。墨西哥政府教導孩子許多錯誤的訊息。但我們的教育不是要小孩往上爬，去得到更好的職位；學習電腦，不是為了靠電腦獲得好的薪資，而是一起為村落做點事。種植、工作、成為組織裡積極的運動者。雖然我們面臨經濟困境，許多人飢餓生病致死，教育

如此困難，但我們不會放棄。」

（不知道為什麼，我在查巴達學習之旅中遇到的印地安人，說起話來都真誠地透露著樂觀的認定。）

掌管教育的游擊隊員，希望查巴達自治區獨立於政府之外的教育，能夠讓族人成為有能力與村落一起奮戰的印地安人。但情勢在樂觀的話語勾勒背後通常被戳了洞，風吹過，輕易就聽見那現實的缺漏。山區教室缺乏的不只是師資，貧窮仍是最大的障礙。孩童一不小心就要餓死病死，遑論教育。尤其在印地安村落，男女位階仍傳統的不平等，受教權於男女仍有落差。那是為什麼查巴達革命後會制訂法則，言明「女人有受教育權」。規範其實是願景，透露出現實，女人通常沒機會受教育。

我閱讀過一個住在非查巴達自治區的女孩，從家裡逃跑去學習的故事。她聽聞查巴達的女人有革命法則保護，在那裡，「女人可以不被打，不管是家人或陌生人」、「女人有權決定伴侶，不被強迫去結婚」、「女人有權決定生幾個小孩」、「有權工作並獲得給付」、「有權參與組織的事物，並獲得領導地位」、「有權當統治者並擁有軍備」、最重要的是「有權被詳盡說明女人的革命法則」。名叫Isidora，Tzeltal族的印地安女孩因而一心一意想要加入EZLN，她說：

「早就傳聞山裡的革命組織有女人，那給我勇氣去逃跑，因為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像住在革命軍裡的女人一樣自由。我想要學習讀書寫字。雖然我的村落有學校，但是沒有老師。我每天除了撿材，到廚房幫忙，沒有其他事可做。因此，我從十三歲就想加入EZLN，但是十三歲還太小，我逃跑，沒有經過父母同意，EZLN又把我送回去。回去後我被打，再次逃跑去軍隊，不過又被回去。但是我是下定決心的，我告訴Marcos如果他們不收留我，我會繼續逃下去，直到我被叔叔打死。看到我這麼

堅定，為了不想讓人們說，軍隊強擄了年輕女孩，他們去和我的村落談，後來我的村落終於同意。」

革命是場教育，必然牽涉到性別。查巴達無疑是致力於推動女性意識的，但女性意識的落實，必然遭遇生活化的挫折與挑戰。雖然有女人的革命法則，印地安女人要面對的可不只是村落外面騷擾、挑釁的軍隊及民兵，更有家庭切身的限制。不可以。不可以外出聚會討論。不可以。不可以放下廚房不理。不可以，不可以的絲線綿密纏繞，縛綁的不只是印地安女人，但是身為女人，又是窮困的印地安女人，受的苦往往是雙重的。

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我常又餓又病。（現在也仍然吃不好。）

後來我長大，發現我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別人有，我們沒有。為什麼我們沒有？我目睹我四五個弟弟妹妹陸續死掉，慢慢的，我知道我們必須去反抗。因為我若是什麼都沒做，餓死的事情會繼續發生。於是，不止我，很多女人都成為游擊隊員。

剛開始，我必須為這付出代價。縱使我很努力的解釋為什麼要加入游擊隊，男人不懂。男人不喜歡我的想法。他們認為女人就該好好的待在家裡照顧小孩。有些女人也這樣認為，我不喜歡她們。

「我不喜歡她們」，這句話讓我莞爾。女人間的情緒干戈透過翻譯輾轉來到我面前，令我會意地心生微笑。這是二〇〇一年三月八號，CCRI（Clandestine Revolutionary Indigenous Committee）中一位女性成員，在墨西哥市以簡易的（剛學會沒多久的）西班牙語說的話。

CCRI的成員，是查巴達各支援村落選出來的代表。按組織架構，EZLN必須聽命於CCRI的決議。Marcos在一次接受採訪時就表示，發動武裝攻擊是村落投票決定的。而參加



國際婦女節活動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Rebel Woman) 的CCRI成員，也隸屬於EZLN。我的研究不夠深入，無法確切歸納分析查巴達各支援村落的運作情形。權力如何分配？性別平等落實的程度？倒是在San Cristobal時從查巴達「出產」的木頭小玩偶中，先認識Marcos之後便是Ramona。

在CCRI第一次出現在國際媒體時，Ramona帶著她的武器——像其他人一樣，一枝老舊的來福槍，安靜地，直視前方，走出來。透過年輕游擊隊員的翻譯，她告訴記者，在成為CCRI領袖前，她靠手工刺繡維生，有時候一件大的作品必須耗費三年才能完成，然後她會走去San Cristobal將刺繡賣給藝品店，不過通常被給付很少的價錢。她說她的任務是去喚醒與她相同處境的同胞。Ramona的黑髮已有幾縷白絲。也許是她瘦小但目光有神的形象吸引人，或者她作為EZLN領袖的初次公開亮相，恰足以填補國際媒體對於女性游擊隊員形象的匱乏與缺角，她很快紅了起來，成為產量僅次於Marcos的木頭小玩偶造型，長髮，斜背著來福槍。（雖然後來她甚少露面。）Emmanuel還曾經炫耀地指著他身上的美麗背包對我說，那是Ramona親手做的呢！

不過在形象符碼之下，Comandante Esther一句「我不喜歡她們」，倒生動勾勒出女人的革命法則在村落推行時會真實遇到的細節。為了自由而逃跑抑或為了家庭而固守？成為游擊隊員或信仰一切皆是上帝的旨意？衝突的思想及各自處境，革命，革命只是一場教育的開端。

拒絕政府的學校之後，叢林裡仍迂迴著衝撞著、沈思著往返著一堂接一堂的課程。誰是老師常出乎預料。例如在La Realidas遇到一匹棕咖啡色駿馬從小徑奔跑而過，當氣流從我身旁席捲馬兒嘶息以及吆喝聲，騎在馬背上的印地安男孩，飛揚的身影讓我打心底讚嘆：

（老師，我也想學騎馬）。例如那個下午，剛考上墨西哥大學的男孩與我坐在La Realidas草坪，望著遠近山巒，問我，台灣是什麼地方？

革命呀是場教育，餘震至今，想法飄山蕩海地分享傳遞！

樂：

女孩從樹梢對我探望，裙襬下的小腿沾滿泥巴，她手中拖著盤子，裝有沙土、樹葉及花朵。瞳眸晶亮，彷彿在對我說……她在對我說什麼？陌生的音節，我聽不懂。站在樹下，我遙望她像遙望世界的彼端。對峙。互懷善意但漸趨尷尬的對峙。

她從樹梢滑下來，帶著辦家家酒的盤子，往樹林作伴的破舊木造屋走去，並不時回過頭來望我。

（要我跟你去嗎？）我疑惑地跟著她來到木造屋前，堆滿木材。她轉過身來看我，站在屋前一動也不動。

（什麼意思呢？）我難以迎上前去，退敗地走不過去。

（妳要我跟你玩嗎？但我們言語不通耶。）

（還是，妳其實拒斥著我，回過頭，只不過確認我是否已走遠？）

唉，不懂。

我尷尬地回轉過身，離開。

回到住處，從木造屋的窗口望出，隔著鐵絲網，另一個村落緊鄰。在La Realidas，印地安女孩的玩具是樹葉花朵，男孩則有彩色玻璃珠。有次我還看見兩個印地安男孩站在村落草地，各拿一個養樂多瓶罐，模仿電話的傳聲筒，由中間穿過的絲線對話。啣。音波震盪。從前島嶼村落也流行過這玩法。但是隔著鐵絲網在草叢間劃起的界線，有天我無知散步著，聽見風琴樂音及歌聲，朝音樂的源頭走去，La Realidas的年輕男子卻適時叫住我，示意我不能過去；那是另一個村落，接受統治者安撫的村落。（過去會被殺掉）。年輕男子作勢往頸

項橫切。一邊隸屬政府，一邊是反抗軍。我站在邊界，從木造屋窗口望出去，發現那邊的印地安女孩在家門前玩辦家家酒，隔不到幾公尺，手中抱著的是金髮碧眼的洋娃娃……。

#### 十四、濃霧中的篝火

「有些人接受政府補助，就住在我們隔壁，那些村落敵視我們，但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選擇。希望有一天，他們也能夠理解，他們其實和我們有著相同的處境，印地安原住民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

當Zenon發問，在La Realidas發現隔壁村接受政府補助，經濟狀況明顯比La Realidas好，不知EZLN對此有什麼看法時，站在坡地的游擊隊幹部如此回答。

那是新年過後，我們離開真實村，前往查巴達另一個支援村落Oventic。Oventic以木樁、鐵絲網及溝渠圍起馬路邊的界線，入口照例有兩三個青年在守衛。從La Realidas坐車來此，氣候轉寒，景致也由綠意盎然的草地轉為霧氣茫茫的黑泥地。一行人進入Oventic，青年站崗處有一間木板及鐵皮搭建的小屋，作為入口商店般地歡迎著客人。木造屋的牆面繪有壁畫，油彩透出木板紋理。一雙雙彷彿哀傷彷彿鎮定彷彿略帶怒氣的眼睛，翹著眼睫毛，從滑雪面罩的黑底張開眼，其上還有一排小人兒手牽手排排站。在我看來，Oventic的壁畫水準比La Realidas高，其中一幅以單純的黑色線條在白色牆壁描繪出兩株玉米，站立著像侍衛般陪襯出印地安女孩蒙面的眼神，更是溫柔堅毅。

新年剛過，歡鬧氣氛猶存，據聞新年場面盛大約莫五千人，但我們資訊有誤，千里迢迢抵達「盛大」旁邊，在慶典後才來到Oventic，不過仍然在村落遇見不少政治觀光客。來自瑞典、義大利、加拿大、當然少不了來自美國的運動者。西雅圖一位導過「民主看

來就是這麼回事」(That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紀錄片的年輕導演也來到，這部片子紀錄西雅圖反全球化的示威行動，但評價不一，如同年輕導演的查巴達紀錄片，真實叢林加電腦特效，像另一種形式的MTV，缺乏深沈。

運動者初認識，彼此閒聊，言不及義。標示著COOPERATIVA(合作社)的小店進出著政治觀光客。我坐在長板凳上，手拄著木桌，望著小店漆成黑色的牆壁及大紅的櫃臺。像島嶼鄉間的雜貨店，Oventic唯一的一間小店也用鐵架陳列罐頭、香菸、水桶、零食等民生用品，紙箱裡放著香蕉串串，收銀處懸掛各色縫製衣裳用的絲線。小黃燈泡不需要燈罩，從山區盜取電力來發亮。一張張DIY的錄音帶，是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歌唱及演講的實錄。要賣給政治觀光客的衣服、海報、明信片、小玩偶及馬靴等，果然被熱情光顧；Tim邊買邊問，每年從世界來到的政治觀光客，是否為村落帶來不錯營收？

「政治觀光客通常在新年時才來，平常人不多，應該沒什麼具體幫助。」Carl回答。

在小店吃完晚餐，炸魚、咖啡及玉米餅，伙伴們拉緊外套拉鍊，戴上毛帽，拿起手電筒，摸黑上坡回住處。沿山壁一整排木造屋，推開其中一間，木門正對著走道，直通牆壁，兩排簡易的木板床上下舖可睡十多人。我猜想這是專為政治觀光客而蓋，因為明顯不是印地安人的居家格局。拉出睡袋，鋪在刨得並不怎麼光滑、甚至一小不心可能會被木板皸裂刺傷的床面，穿毛衣鑽進睡袋，摩擦著穿襪的腳指頭，雙手環抱，仍覺背脊寒涼。寒意從泥地竄起，從木造屋嘶嘶透入，冷呀，我哆嗦著起身，依稀看見伙伴們的睡袋，一床床，在淡薄月光清冷的探照中。夜寂寥呀，大家都入夢了吧，我嘆口氣，蜷縮的躺下。 >> 待續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350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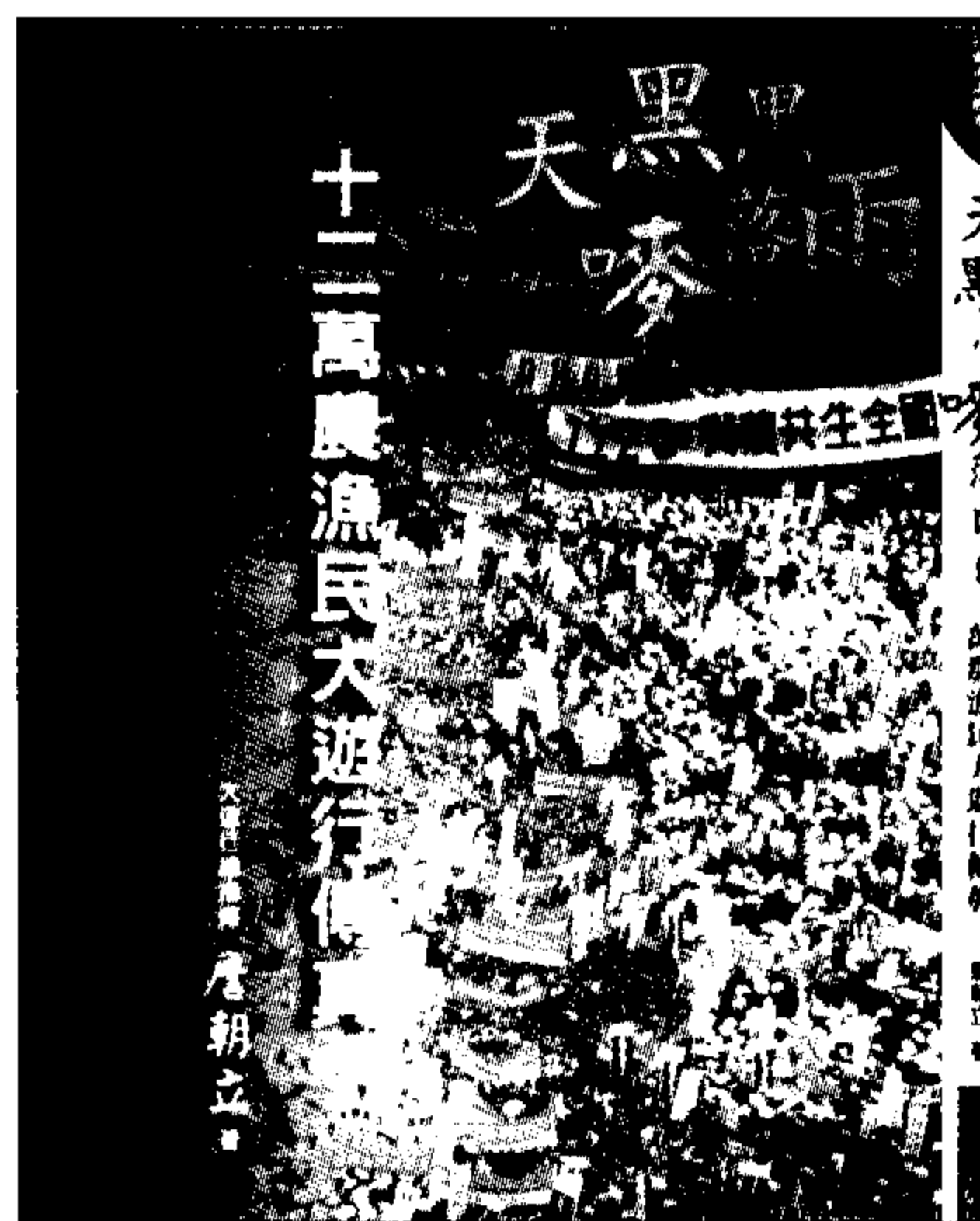
《天黑黑嘜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350

——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走進台灣》◎周良沛 / 定價NT300

—— 光和影的心靈紀實

作者周良沛是一位大陸資深的進步作家，且在台灣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本書超越了兩岸的歷史糾葛和現實迷障，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情，用獨特的紀實散文風格，描寫了台灣生活底層中許多不知名的或知名的人和事。藝術地概括了九〇年代前後台灣複雜的社會變動中的光和影，有鮮明的時代感。



直接訂購 優待

郵政劃撥 / 19747069

■電話 / (02)87714051 ■傳真 / (02)87713801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地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8巷2號2F

□涂照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劉進慶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段承璞

《台灣戰後經濟》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谷浦孝雄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陳玉璽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台灣之經濟》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展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Winekler等編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杜繼平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三八〇元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郎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凡 可享有以上書籍 優惠，郵撥時  
請填上訂戶編號。若須 則加收

出版社 郵撥帳號：一一七四六四七三 / 電話（〇二）二三二二二三五七